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碩士學位論文

指導教授：洪 仁 進 博士

游 振 鵬 博士

全面抗戰時期吳俊升高等教育政策推動之研究

A research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promoted by
Ou Chung-She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n China

研究生：劉 宣 麟 撰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八 年 八 月

謝 誌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轉眼間研究所生涯即將邁入尾聲，完成論文的那刻如釋重擔，這四年的日子轉眼即逝，對我而言也是最難熬的一段。回顧碩班生活，工作、學業都要兼顧，著實不易，這四年我身兼數職，拼命在自我、工作與課業中打轉，圖書館、咖啡廳成了我下班後停留的場所，研發教案、閱讀文獻、撰寫論文，日復一日。感謝所有讓我蛻變的一切，論文的完成承蒙許多人的支持以及鼓勵，每當我想放棄之時，卻又見到一絲曙光。

首先，感謝我的指導教授洪仁進老師，在論文撰寫期間，總是配合我在學校的作息，利用下班後的時間耐心指導我，老師悉心地教導與提點，給予我滿滿的鼓勵，讓我失措的心得以穩定，老師除了是我論文的指導教授外，他豐富的教學與行政經驗，亦是我的教學指導教師，帶著我用不同的視角看問題，並帶領我一步步處理問題，找尋答案。

此外，我由衷感謝文化大學教育系單文經教授、游振鵬教授，兩位教授是我生命中的貴人，感謝從在大學修您們的課起，一路提拔我、鼓勵我，並在畢業後推薦我到臺北市立陽明高中兼課。老師對於學生的照顧、教學的熱情，以及做學問的態度，數十年來如一日，是我學習的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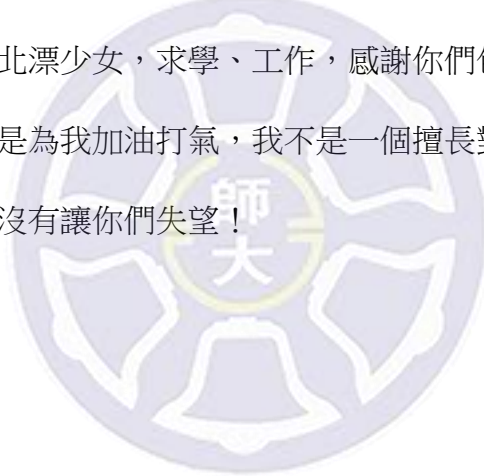
論文口試期間內，感謝師大教育系葉坤靈老師，老師給予的寶貴意見與指正，讓此篇碩士論文更臻於完善，在此表示深摯的謝忱。

感謝臺北市立陽明高中，在我碩士的生涯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謝謝洪金英校長，可以讓我同時當個研究生、輔導老師，感謝我的同事家瑋、逸凡、堉梅、秀蓉、承恩、政川，謝謝你們在我寫論文的這段時間，給予我的支持，以及在工作上給予的

協助，有你們才能讓我順利完成這本論文。實習後來到陽明，直到研究所畢業，短短的四年，獲得滿滿的教學技巧、行政經驗，也產出了許多得獎的教案，這些都是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學習與經驗，真的很感謝一路陪伴的你們。

在求學期間內，同學們彼此的情誼是最值得回憶的歷程。感謝研究所同學湘縈、鈺婷、瑋庭、意翎學妹、佳慧學妹，在研究上適時的指點與陪伴，還有冠華畢業後還是不斷關心我的近況。除此之外，還有我的智囊姊妹團，跟我一起北漂的小愛、在奧地利的小桃、鎮守高雄的小竹，雖然不常見面，但你們總能在我低潮的時候，逗我開心，讓我充滿電繼續走下去。遇見你們，我會永遠珍惜這個緣分。

最後，感謝默默支持與關心我的家人，感謝你們讓我在求學過程能無後顧之憂，感謝你們體諒我執意當個北漂少女，求學、工作，感謝你們包容我對事情執著的個性，感謝你們忙碌之餘總是為我加油打氣，我不是一個擅長對家人表達愛的人，但我真的很愛你們，希望自己沒有讓你們失望！



宣麟 謹致

一〇八年 夏

摘要

吳俊升在學術界最廣為人知的代表作之一是《教育哲學大綱》，對於他在行政上的表現則較為陌生。在全面抗戰時期，吳俊升擔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長一職，提出了許多改進高等教育的措施，保障戰區學生的學習與生活，針對課程內容與師資進行改革與調整，除了鞏固高等教育，也為戰時高等教育揭開精彩的一頁。

為能更深入了解吳俊升在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工作表現，本文參考相關的政府檔案、期刊雜誌、學術論文等資料，力圖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首先，本論文先探討吳俊升的學思背景，針對吳俊升為穩定高等教育，在紛擾教育意見中提出「戰時教育平時化」的思考，不僅保存了高等教育，也奠定了抗戰建國的基礎，再論吳俊升抗戰時期配合國民政府教育部，推動的各項教育政策的背景與狀況，最後進行分析討論，並提出對台灣教育的啟示。

關鍵字：吳俊升、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

Abstract

Ou Chung-Sheng who is the author of the most well-known masterpieces—Philosophy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Ou Chung-Sheng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learning and livelihood of the student in the battleground, Ou Chung-Sheng proposed measure to improve higher education. Such as reform Course, teacher qualifications formulate. In addition to consolidating higher education, it also unveiled a wonderful page for higher education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In order to understanding of Ou Chung-Sheng's perform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during the full-scale Anti-Japanese War, this article refers to government archives, journals, scholarly papers and other materials.

First, according to Ou Chung-Sheng's academic background, he propose the idea of "normalization of education during warfare" while the turbulent education opinion for stable higher education. It not only preserved higher education, but also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Finally, analyzing and discussing the policies by Ou Chung-Sheng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Keywords: Ou Chung-Sheng , Anti-Japanese War ,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目次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 9 |
| 第三節 研究範圍 | 11 |
| 第四節 名詞釋義 | 12 |
| | |
| 第二章 吳俊升的學思之旅 | 13 |
| 第一節 吳俊升的生平 | 13 |
| 第二節 吳俊升的教育思想 | 17 |
| 第三節 吳俊升的重要著作 | 26 |
| | |
| 第三章 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 | 31 |
| 第一節 改進中國高等教育的芻議 | 31 |
| 第二節 高等教育制度的分歧與確立 | 37 |
| 第三節 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任務 | 47 |
| | |
| 第四章 吳俊升在抗戰時期所推動的高等教育政策 | 53 |
| 第一節 戰時教育平時化在國難時期的提出 | 53 |
| 第二節 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進與調整 | 57 |
| 第三節 貸金制度的推展 | 66 |
| 第四節 新公費制度的推展 | 72 |
| 第五節 師資審查制度的完備 | 76 |
| | |
|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83 |
| 第一節 結論 | 83 |
| 第二節 建議 | 87 |
| | |
| 參考文獻 | 90 |

表次

| | | |
|-------|----------------------------------|----|
| 表 1-1 | 抗戰時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概況表（1936-1945 學年度） | 3 |
| 表 1-2 | 抗戰前、抗戰時、抗戰後大專院校分布比較 | 6 |
| 表 3-1 | 抗戰前與戰爭結束時專科以上學校教育人數比較表 | 46 |
| 表 4-1 | 抗戰期間國統區法幣發行與物價變動率（1937 年—1945 年） | 72 |
| 表 4-2 | 全面抗戰前（1936 年）到全面抗戰結束各科院學生人數統計表 | 74 |
| 表 4-3 | 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薪俸表 | 80 |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三節為研究範圍，第四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

抗戰至今已八十餘年，回首過去中國「黃金十年¹」期間，國民政府內憂外患，在中共勢力擴張、日軍大舉侵華，戰時中國發生前所未有的危機，但國民政府為強化戰時的經濟建設，以及適應持久戰爭的需要，在抗戰時期提出許多改革的主張，有許多事蹟都是令人非常尊崇的，教育亦是其中之一。

八年抗戰時期是中國現代大學辦學史上的奇蹟，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歷史發展有著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對於國家長期發展非常重要，難以在短期看到成效；教育亦是國家大計，人才是立國根本，必須長期投資以建立優質的教育體系才能培育人才，維持國家生產力及競爭力。然而在烽火連天的抗戰時期，山河殘破、民生凋敝，當時教育文化機構受敵軍轟炸蓄意摧殘破壞，工商、農業、軍事、教育，無一不受影響，尤其大專院校的創設，必須考量該地區的文化水準與社會經濟狀況，但中國長期以來沿海與內陸發展不均衡，教育事業東西失衡，導致高等教育地理位置分佈不均過分集中於少數地區，隨著戰區逐漸擴大，中國沿江沿海的大學在數月內一個接著一個失守，且華北沿海一帶又為大學中心，集合了大學、學院、專科學校，國民政府首要任務便是積極從淪陷的戰區拯救大專院校的師生，這些教學設備、圖書、檔卷，教育與文化大規模的遷移，原在戰區以內的博物，也皆大費

¹ 「黃金十年」指國民政府從 1927 年 4 月 18 日定都南京，到 1937 年 11 月 20 日遷都重慶期間的中國 1930 年代，中國國民黨領導國民政府統一中國，此時期的政治、經濟、基礎建設、文化發展、教育、軍事……等，各項發展都有一定成就，整體環境為 1840 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最高水準。

周折的被迫遷移至隱蔽的後方，戰爭迫使教育在廢墟中重建，在戰火中重新找尋生機。

自清末面對一系列的戰爭挫敗與改革救國，形成了「刺激—反應」的循環。在教育上，廢科舉、興學校，期待以教育改革個人，改造民族，救國家的危亡，但卻一味仿效歐美的教育制度與方法，漠視了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與需要，使得教育是否有救國的效力在時局紛亂的中國出現了正反不同的聲音，尤其在戰亂時期，人民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經濟衰敗，社會窮困，戰爭危險增加，當人民缺乏民族觀念，個體面臨外敵入侵時，往往因其人生經歷、價值取向以及具體處境的差異而選擇了不同的效忠對象。²

在國難期間，國內教育走向應何去何從教育界議論紛紛，諸多學者針對「戰時教育方針」展開了熱烈的論戰。如：張伯謹提出的維持現狀、徹底改造；李建勛與許椿的充實改進、集體主義、應時救濟；吳景宏的徹底改造、維持現狀、調和折衷……等，可見對於抗戰時期的教育方針是分歧的。所謂「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民組織的健全、教育的普及、愛國思想的發展關係了國家的存亡，中國在抗戰初期，地方上層尚缺乏民族國家概念，謀生不易的下層民眾更慮不及此，生存是他們最大的難題。戰爭無法僅靠武力，武力亦須有人民做為後盾，人民沒有真實的力量，武力便無從發揮。如在教育史上，19世紀斐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以教育復興德國，表明戰爭的失敗是因為人人喪失了自尊與自信，僅存著自私自利的心，因此必須要以教育的力量改造國民心理，不僅喚起國魂振奮民心，並且提出並施行改革教育計畫，直到一八七〇年戰勝法國，完成德意志帝國的統一。由此可見，斐希特以教育救國之效能是不可否認的。

² 劉潔，〈抗戰初期華東淪陷區親日群體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98)，頁 111。

所幸當戰爭發生，軍事開支大幅增加，依常理而言，教育事業本來應該是停滯不前，但實際狀況並非如此，在這段艱困的時期，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投注的經費僅次於軍費，中國在教育事業有了相當大的進步，大專院校在數量上不但沒有因為戰事萎縮，反而在數量上仍持續維持和擴展，從抗戰前的一〇八所，到抗戰勝利，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數成長至一百四十一所（如表一），師生秉持堅毅的精神，扭轉在戰火中不利之情勢，完整的保留中國文化精華。

表 1-1：

抗戰時期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概況表（1936-1945 學年度）³

| 學年 | 總數 | | | | 大學 | | | | 獨立學院 | | | | 專科學校 | | | |
|------|-----|----|----|----|----|----|----|----|------|----|----|----|------|----|----|----|
| | 總計 | 國立 | 省立 | 私立 | 總計 | 國立 | 省立 | 私立 | 總計 | 國立 | 省立 | 私立 | 總計 | 國立 | 省立 | 私立 |
| 1936 | 108 | 26 | 29 | 53 | 42 | 13 | 9 | 20 | 30 | 5 | 9 | 22 | 30 | 8 | 11 | 11 |
| 1937 | 91 | 24 | 20 | 47 | 35 | 12 | 5 | 18 | 32 | 6 | 6 | 20 | 24 | 6 | 9 | 9 |
| 1938 | 97 | 29 | 21 | 47 | 35 | 14 | 3 | 18 | 35 | 9 | 6 | 20 | 27 | 6 | 12 | 9 |
| 1939 | 101 | 36 | 20 | 45 | 37 | 15 | 4 | 18 | 36 | 11 | 6 | 19 | 28 | 10 | 10 | 8 |
| 1940 | 113 | 41 | 42 | 51 | 38 | 16 | 4 | 18 | 42 | 12 | 9 | 21 | 33 | 13 | 8 | 12 |
| 1941 | 129 | 46 | 31 | 52 | 38 | 16 | 4 | 18 | 45 | 15 | 10 | 20 | 46 | 15 | 17 | 14 |
| 1942 | 132 | 53 | 28 | 51 | 41 | 20 | 3 | 18 | 44 | 15 | 10 | 19 | 47 | 18 | 15 | 14 |
| 1943 | 133 | 54 | 29 | 50 | 40 | 20 | 0 | 18 | 49 | 16 | 14 | 19 | 44 | 16 | 15 | 13 |
| 1944 | 145 | 53 | 33 | 54 | 40 | 20 | 0 | 18 | 50 | 18 | 12 | 20 | 55 | 18 | 21 | 16 |
| 1945 | 141 | 56 | 31 | 54 | 38 | 22 | 0 | 16 | 51 | 17 | 12 | 22 | 52 | 17 | 19 | 16 |

資料來源：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³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400。

保護稀有的高等人才，實屬不易，可見當時國民政府對於中國的教育發展投注相當大的心力。中國的高等教育能在戰亂中持續發展，在紛擾的黨、團、軍勢力的干擾下，政治與教育合流的精神難能可貴，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貳、高校內遷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發展

在經歷日軍轟炸破壞、物資條件惡劣的情況下，政府處境極為艱困，但仍在教育行政措施進行革新，投入經費與資源於人才培育，盡心竭力於學術研究，讓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在數量或品質上都能有顯著的效果。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把尚未被日軍破壞佔領的基地，也就是相對於前線戰區或淪陷區而言以外的地區稱為大後方，如：四川、貴州、雲南、新疆、陝西…等，將這些地區作為民族復興的根據地，並劃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如下：重慶、四川為核心地區；西南地區的雲南、貴州、廣西與西康為拓展地區，以及西北地區的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為拓展地區；上述以外屬國民政府的控制區則為外圍地區。

抗戰前，中國高等教育的地理分佈長期集中在少數地區，全國大專院校有一半以上座落於東部沿海諸省，包括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成都…等地區（表二），高等教育地理位置分佈不均，學校分佈尚未能均衡分佈於全國，以至於七七事變日軍全面侵華時，華北及東南沿海教育發達的地區首當其衝，日軍的船堅砲彈對中國高等學校進行有計劃的破壞及摧殘，持續達八年之久，對中國造成巨大的影響，長期的戰爭使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處於崩潰的邊緣，嚴重威脅大專院校的生存與發展，也影響廣大師生的生命安全。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教育受到嚴重的破壞，但所幸有國民政府積極拯救淪陷區的大專院校師生，推動高校內遷至大後方的政策，才能正常維繫高等教育，拯救相繼淪陷的學校，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如：西南聯合大學。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是由國立北京大學、國立清華大學，以及私立南開大學所組成，學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因戰事遷往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是西南聯大的前身，但仍因日軍持續發動攻擊，在無法免於日軍襲擊的情況下，校舍、經費、圖書設備與儀器都受嚴重的破壞，導致基本辦學條件都極其困難，學生只能繼續兵分三路，顛沛遷徙至昆明。教育部在隔年四月發電命令，將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正式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堅持辦學八年多優秀人才輩出，如：許多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沃爾夫數學獎得主，陳省身；著名的大學教授，朱自清、朱光潛…等，在教育、科技、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都培育出傑出的專家學者。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儘管創立至結束僅有不到九年的時間，卻能培育無數英才，卓越的教學成效更是譜寫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輝煌的一頁，主要因為在烽火連綿的戰爭歲月中，師生仍能抱持剛毅堅卓的精神，除了得到國民政府的關注與支持，智慧廉潔的集體領導，以北大校長蔣夢麟、清大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為常務委員及教育部代表楊振聲組成校常務委員會，進行要那個項決策，各司其職，互相合作，領導優秀的教師、學生，是西南聯合大學取得成功的內在原因。直到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解散，各校分別遷回原址復校。這段時期產生了無數故事與傳奇，成為了中國大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奇蹟，帶給中國高等教育深刻的意義。

高校內遷雖然是時勢所趨，卻也顯示出長久以來教育資源分佈不均的問題，高校集中於東南沿海，導致戰事一發生沿海地區學校文化中心損失慘重，據國民政府教育部一九三八年八月底調查統計，全國一〇八所高校中，被破壞者達九十一所，占大學總數百分之八十四，有十四所大學全部被破壞，十五所高校勉力維持，二十五所高校破壞嚴重被迫停辦。由日本侵略節節進逼，有許多東部沿海的學校已無法正常進行教學活動，因此國民政府為維持教育，謀求各級教育的安全，以保存中國教育命脈，一九三七年八月國民政府在特別會議中討論，將大學與知識份子西遷，並於同年九月二

日，教育部令沿海各公私立學校遷移至內地上課，這亦是中國史上第一次規模宏大的教育大遷移。

學校西遷雖是戰事緣故，卻也因此促進邊疆地區的教育發展，提升西南地區教育文化水準，藉大學與所在地方的雙相互動，人才的會及與知識的傳遞，不僅對於當地居民有了啟迪的作用，也促成教育現代化，相較於抗戰前與抗戰後，西南地區的教育文化因此而提升，也讓長期學校分佈不均的問題有了改善。

表 1-2：

抗戰前、抗戰時、抗戰後大專院校分布比較⁴

| 地區 時間 | 江蘇省 | 河北省 | 四川省 | 廣東省 | 湖北省 | 福建省 | 江西省 | 陝西省 | 湖南省 | 廣西省 | 浙江省 | 遼寧省 | 山東省 | 甘肅省 | 山西省 | 雲南省 | 貴州省 | 吉林省 | 安徽省 | 西康省 | 河南省 | 新疆省 | 總計 |
|----------|-----|-----|-----|-----|-----|-----|-----|-----|-----|-----|-----|-----|-----|-----|-----|-----|-----|-----|-----|-----|-----|-----|-----|
| 戰前 | 38 | 23 | 4 | 8 | 6 | 4 | 0 | 0 | 2 | 2 | 4 | 0 | 3 | 1 | 5 | 1 | 0 | 1 | 1 | 0 | 3 | 1 | 111 |
| 戰時 | 23 | 7 | 21 | 5 | 1 | 5 | 4 | 7 | 4 | 3 | 2 | 0 | 0 | 2 | 1 | 6 | 4 | 0 | 0 | 1 | 2 | 1 | 101 |
| 戰後 | 57 | 24 | 21 | 17 | 10 | 9 | 8 | 8 | 6 | 6 | 5 | 5 | 4 | 4 | 3 | 3 | 3 | 3 | 2 | 2 | 2 | 1 | 207 |

資料來源：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回顧這段歷史，在艱苦的歲月裡，幸虧有國民政府對教育的推展持續不輟，動員高校師生投入抗日戰爭，並且能與時俱進的推廣各項教育政策，培育抗戰與建國併重的人才，不僅維繫國家命脈，也保存中華民族文化，在烽火中仍能保持剛毅堅卓的精神實為難得，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參、吳俊升為抗戰時期高等教育進行的改革

一個國家的政治包含其經濟、教育、軍事、財政…等，教育是政治中的一環，相互聯繫，高等教育在抗戰時期有其使命，教育政策的制訂、推動與執行考驗主政者。

⁴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

根據初步的文獻分析，發現抗戰時期的教育仍能維持，主要是因當國家面臨生死存亡，抗戰與教育需做抉擇時，蔣介石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⁵表示：「我們切不可忘記，戰時應作平時看，切勿未急之故丟卻了基本，我們這一戰，一方面是為爭取民族生存，另一方面就要於此時期改造我們的民族，復興我們個國家，所以我們教育上的著點眼，不僅在戰時，下應該看到戰後。⁶」由此可見，主政者並沒有選擇犧牲教育，反倒更重視教育，認為教育不只是應付一時非常局面，應為來日大難做準備，彰顯了教育平時可培養人才，在戰時可發揮禦侮的力量，不論抗戰或建國，都須仰賴教育。

國民政府為了準備長期抗戰適應暫時需求，在有限的經費下又要兼顧教育事業不因戰火而中斷，除了有國聯教育考察團提出中國教育問題以及改革之初步方案外，國民政府實施教教合一的統制，徵召當時還是大學教授的吳俊升擔任高教司長，並推行了諸多教育措施，如針對高等教育的改革，吳俊升首先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在天津大公報《明日之教育》發表〈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⁷，在文中吳俊升指出，中國教育雖然沒有始終一貫的哲學，但在各個主要的時代之中，都各有其顯明的哲學，作為教育實施的指導，如：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一八九〇年代以來中國思想界的流行語，支配了清初興學校到辛亥革命為止這幾十年的教育，但自從民國成立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哲學就逐漸被推翻，各派的教育思潮，沒辦法支配中國教育的全體，教育缺乏哲學指引，導致教育理論、方法紛紜變化，失去重心，吳俊升認為中國的教育應考量過去中國的文化以及現在的實際需求，顧及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經濟、教育…等各方面，做綜合的考察，演繹出指導原則作為實施基礎。尤其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國難時期，吳俊升在一九三五年於《大公報》發表〈論國難期內的教育〉，此篇文章對當時停止平時教育改辦戰時教育發生了平衡的

⁵ 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於 1939 年 3 月 1 日在重慶召開，由教育部長陳立夫主持，為使抗戰時期的教育能更有效地實施，以「抗戰建國時期教育實施方案」為主題。

⁶ 教育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紀錄》，頁 6-7。

⁷ 吳俊升，〈中國需要一種哲學〉，《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 45-54。

作用，因為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秉承中央抗戰與建國併重的決策，認為大學院校不單只是維持正常教育，還要因應戰時和將來需要酌量擴張，這與吳俊升的戰時教育主張相合。在《教育生涯一周甲》中，吳俊升亦提到當時教育部陳立夫部長便是透過這篇文章任命他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希望能夠藉由吳俊升的教育經驗與其教育主張整頓中國長期以來的教育問題，如：統一大學教育權，針對大學課程分歧、內容瑣碎支離、大學課程不符合中國需要、課程各校必修選修科目不一致、課目重複不一致的問題進行大專院校的整頓及課程的整理；在師資的部分，針對教授資格冗雜的問題，規定大學教員學經歷、進修方式與規定、薪資多寡，透過教師資格審查，提高學術研究水準，培育抗戰建國事業的人才；以及為讓站區內的莘莘學子能夠將低戰爭對於學習的影響而推動濟貧、扶貧、救貧、脫貧的貸金與公費制度…等，這些戰時教育政策的推動，有效穩定戰時的教育環境，也改善大學生素質參差不齊的問題，對於抗戰時期的教育有相當大的改進。

因此本研究便以抗戰時期為背景，回顧當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長吳俊升，在陳立夫部長的領導下，所推動各項政策與作為，這亦是吳俊升認為自己一生事業中最有成就的一段，且國內關於吳俊升教育理念探討的文獻尚不多見，因此值得深入探究，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依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是如下：

1. 分析抗戰時期整體教育工作的發展。
2. 探討吳俊升的學思背景與生涯進路。
3. 探究吳俊升在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工作的推展與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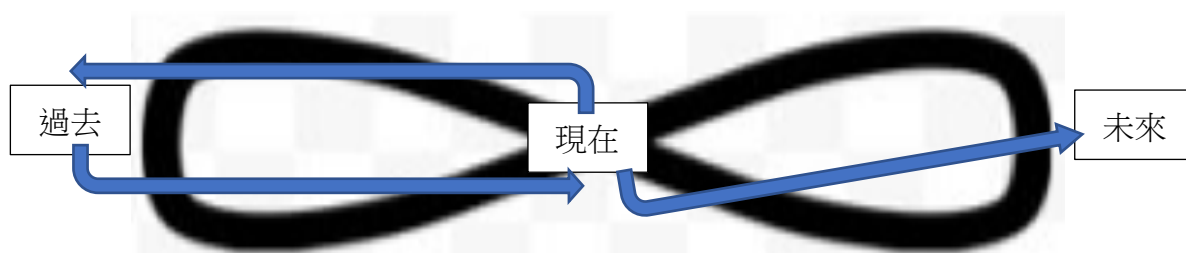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節主要說明本研究採取的研究方法，並根據研究目的說明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推動的理由，最後擬定研究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歷史研究法，所謂歷史研究係指有系統的蒐集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俾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⁸歷史研究就如同在解釋或分析過去所發生的現象，鑑往知來，協助人類了解過去，並在某種程度內預測未來。

教育的歷史研究，就如同下圖的歷史弧，要了解教育政策推動的原因與過程，就必須由現代出發，然後重建過去歷史的原貌及歷史的發展，透過對過去事件的研究，瞭解當今制度、政策及問題的歷史脈絡，以古鑑今，學習問題解決的方式。根據研究過去的事件，了解當今的制度、措施與問題的歷史背景，並從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中，找尋事件發展的因果關係與規律，從過去的經驗中，作為瞭解現狀與預測未來的基礎。歸納來說，歷史研究的目的是在於了解史實的真相，探討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及演進的軌跡，進而瞭解現象或預測未來。⁹



⁸ 王文科，《教育研究法》，頁 283-284。

⁹ 李奉儒，〈教育學的歷史研究之現況與趨勢〉，載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教育研究方法》，頁 285-286。

探討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推動的原因，必須先從時代背景因素瞭解當時的情況。因此，本研究首先對吳俊升的生平事蹟、學習歷程、教育著作宏觀的探討，分析歸納其思想淵源。其次蒐集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相關史料文獻，針對蒐集的資料分析判定，再透過對史料的考證、統整、歸納分析，參照吳俊升在抗戰時期推動高等教育政策的時代背景、教育環境，以求理解。

貳、研究步驟

本論文的研究步驟如下：

- 一、草擬研究步驟與大綱
- 二、蒐集吳俊升與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之相關史料與文獻
- 三、蒐集、閱讀與梳理史料與文獻
- 四、初擬研究計畫
- 五、整理、研讀相關史料與文獻
- 六、研讀、整理吳俊升學思歷程
- 七、分析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政策與內容
- 八、撰寫論文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研究主要選取吳俊升的學思歷程，相關著作，以及抗戰時期所推動的高教政策加以分析。就研究時間而言，主要是以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四年為主，亦即吳俊升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推行之重要的高教政策。

然而，吳俊升的教育思想與其在抗戰時期推行的高等教育政策並非憑空產生的，因此必須先就吳俊升的生平、教育思想、教育事業進行探究外，亦須了解抗戰時期的社會背景與時代思潮。故時間大約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前，至一九四五年年日本裕仁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成功為止。



第四節 名詞釋義

壹、全面抗戰時期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中國對日抗戰便開始，期間雙方曾發生數次軍事衝突¹⁰，但國民政府為了爭取時間避免大戰爆發，隱忍對日。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並稱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拒，日軍隨即發動進攻，開啟了全面侵華戰爭。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不再隱忍妥協，反倒是以「積極運兵北進備戰」¹¹，中國隨即展開延續長達八年無間隙地處於戰爭狀態，依據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於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在江西廬山發表的「廬山聲明」，文中提到「地無分東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表明國民政府正式對日本全面抗戰的決心，迫使中國的政治中心轉移至抗戰問題，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宣告結束，共持續八年。

貳、高等教育政策

抗戰時期國人對於教育的主張議論紛紛，論者立場不同、觀點不一，教育主張分歧，造成抗戰前期教育徬徨難以安定，因此必須有專家組織對於抗戰與建國並立的教育政策，才能免除中國高等教育的危機。本研究論文針對抗戰時期由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所推動的高等教育政策進行研究，包含課程整理、師資審定、統一招生、畢業總考與學業競試…等行政措施，才使戰時高等教育不僅能有量的擴展，在素質上也得以改進。

¹⁰ 包括 1932 年的松滬會戰、1933 年的長城之戰、1936 年的百靈廟之戰。

¹¹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7 月 9 日。

第二章 吳俊升的學思之旅

人的思想與行為不會倏然產生，而是透過時代與社會互相碰撞而成，本章共分三節，先陳述吳俊升的學經歷，再回顧抗戰時期的時代背景，作為探究吳俊升教育思想的基礎。以下分別闡述吳俊升學術及行政的經歷、其教育思想，與其重要著作。

第一節 吳俊升的生平

吳俊升（一九〇一—二〇〇〇）為二十世紀上半葉著名的教育哲學家，畢生致力於教育，學習教育、辦教育，涉足學術、教學、行政、出版…等，未曾離開教育領域，直到過世不曾停止。

壹、學思歷程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吳俊升出生於江蘇省如皋縣南鄉車馬湖沈家莊祖宅，並於一九〇七進入小學就讀受新式教育。吳俊升自一九一四年通過如皋縣立師範學校入學考試接受師教，畢業後於如皋師範學校附屬高等小學擔任教員，任教國文及英文。

一九二〇年，吳俊升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立志從事教育，因此選擇教育科，開始接觸現代文明，並受許多良師益友的薰陶，如：陶行知、廖茂如、郭曉滄、陸志韋、夢憲承、程其保、陳鶴琴…等，多數崇奉杜威的教育思想，且當時正是杜威來華講學，杜威思想蓬勃發展，吳俊升也漸受其思想影響，開始成為杜威教育學派的信徒。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便在南高附中擔任教員兼推廣部主任，任教倫理學及初中公民，並於國立東南大學補修學分，獲得學士學位。在國內求學的這段時間裡，不僅投注時間與心力在教育上，也常關心國家問題，憂國愛民，並加入少年中國學會成為會員，並於一

九二五年擔任少年中國學會最後一次南京年會的主席¹²。從此舉便可發現，愛國情感自年少時期就貫穿了他的一生。

一九二八年，吳俊升赴法國留學，當時中國社會對於杜威的教育學說的解釋偏重兒童個人方面，但吳俊升受五卅慘案的刺激，認為教育必須兼顧國家主義，因為民族文化與民族生存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在吸收外來文化時，應在原有文化基礎上生根，才不致引起文化的失調。法國留學期間，在教育社會學基礎上下了許多功夫，並由涂爾幹嫡派弟子福谷奈（Paul Fauconnet）教授指導，以 *La Doctrine Pedagogique de John Dewey* 《約翰杜威教育學說》為博士論文題目，取得文科博士的學位，在當時是第一本介紹杜威教育學說較為完備的著作，之後也經烏拉圭教育部翻譯為西班牙文節譯本刊行於南美，並且列入烏拉圭國家出版部的《教育全書》（*Encrclopedia de Eeucatién*）。吳俊升的思想早期偏向杜威主義，這篇論文為吳俊升後續對杜威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往後其著作中都融入了杜威的教育學說，從回歸杜威的文本，為其學說演進時遭誤解或偏向極端的缺點，採折衷的觀點，持平論斷並加以補正；為不公正的批評加以辯護。他的教育思想趨向注重教育的社會方面，並且試圖結合涂爾幹及杜威的觀點以社會威權來平衡個人自由；以義務觀念來平衡興趣主義；以為求知而求知，來平衡為行而求知；以教育為生活準備，來平衡教育即生活¹³。

¹² 吳俊升在少年中國學會最後一次南京學會擔任主席時曾說道：少中原為一偏重友誼與學術的團體，但因為時代政治的衝擊而至解體。由此可知，當時的政治信念深深影響社會活動，感嘆學術無法獨立、中立。

¹³ 吳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頁 61。

貳、教學生涯

吳俊升畢生從事文教工作，從基層做起，從小學教員、中學教員至大專院校教授、系主任、院長、副校長…等，教學經驗十分豐富。他曾於如皋師範學校附屬高等小學擔任教員、國立南京高等師範附屬中學擔任主任、浙江省立紹興師範學校教學，直到一九三一年，負笈巴黎返國後，吳俊升獲得博士學位，使他能夠受聘為大學教授，並赴北京大學任教，曾擔任教育系主任，教授教育哲學、德育原理、教育社會學…等科目，也曾在中央大學、新亞書院、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等大專院校任教。

吳俊升自認在北京大學執教的這五年半中，是其一生教學與研究最為豐碩之時期。教學認真，預編講義，講課時多從教育的哲學與社會的根本出發，組織教材，並在課後經整理與修正後出版，如「教育哲學大綱」、「德育原理」，以及為了德育原理的教授，翻譯法國哲學家 A. Lalande 的「實踐道德述要」，這些專書都是這樣出版的。

除此之外，吳俊升在北京大學時與同事楊廉、劉廷芳共組明日之教育社，按月為《大公報》副刊「明日之教育」發表，如：「重新估定新教育的理論與價值」、「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中國沒有抗日教育」、「論國難期內的教育」…等，這些學術文章的發表，也促使吳俊升能在往後的教育行政上有所表現。

吳俊升在北平教學與著述的生涯直到一九三六年，根據北京大學規定服務五年可以休假一年，他到美國考察實際教育情形，為當時採取美國教育制度，實行新學制的中國提供借鑑。他走訪美國當地的中小學，同時也到杜威寓所拜訪，並針對杜威教育思想問題與中國的教育情形得其指導，直到一九三七年結束考察行程後才返中國。返國後，北京已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已經遷校至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後又隨文學院遷往南嶽，任教後半年便受教育部新任院長陳立夫之邀，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

參、教育行政

在教育行政上，吳俊升亦是從基層做起，曾擔任教育科員、科長、安徽省教育廳主任秘書、國民政府時期高等教育司司長、中華民國教育部政務次長，以及大學校長…等，累積實務經驗，未嘗躐等。

一九三八年吳俊升就任高等教育司司長，中國正處抗戰時期，他因戰時徵召，義不容辭。時任的教育部部長是陳立夫，他曾在其《戰時教育行政回憶》當中提到會任命吳俊升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陳立夫對於吳俊升過去的教育言論與任教成績具有印象，且因為當時必須在正常教育與戰時教育兩者之間作一抉擇¹⁴。陳立夫認為吳俊升對此早有卓越的見解，兩者對於國難期內所需要的教育意見相同，主張國難期內的教育不應只是在原有教育外，另加一部份的特殊教育，也不應該只是應付當下那非常局面的教育，應該將眼光放遠，正常的教育仍應維持，以應付來日的大難，並為建國預備人才，所以決定不應減縮學校數量，且視情況擴展；第二，因為吳俊升先後在如皋師範、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學習，並在北京大學執教，對於中國南北教育均有切身體會，在南方大學受教，而在北方大學任教，南北經驗均有，更能夠了解南北兩地的高等教育情形。

吳俊升擔任高教司長的時間從一九三八年起至一九四五年行政院改組，陳立夫部長離職為止，共七年。這也是吳俊升在《教育生涯一周甲》中提到，受到陳部長的領導與信任，私中同仁的合作，高教同仁的了解贊助，是其一生事業較有成就的一段。亦是本論文主要探討的內容。

¹⁴ 陳立夫，《戰時教育行政回憶》。1973年，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10。

第二節 吳俊升的教育思想

吳俊升的理論與其所提出的教育政策，都反映了所處時代與環境的所思所想，除了在上一節針對其學思、教學、行政經歷做系統的思索外，亦須針對其所屬的時代環境及社會文化做深入考察。

壹、時代背景

清末民初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上均發生劇烈的轉變，教育思想自然跟著迅速改變。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¹⁵，中國結束了長久以來的帝制。同一時間，世界各國都出現了革新大潮，是一個積極進行社會改革的年代，人們反對傳統教育強調嚴格的訓練、注重記憶的形式主義、學生在學習過程處於被動學習的地位，因此人們期待利用科學方法來重建教育哲學。

二十世紀初，美國受杜威的教育理論影響，進步主義是當時盛行的一種教育哲學思潮，建立了許多新學校，並對傳統教育產生反動的一種教育理論，對當時學校教育產生相當大的影響¹⁶，如：關心民眾的教育、強調教育與社會生活的聯繫、做中學、注重教育自由化、學校民主化的議題。

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吳俊升所處的時代正是教育大變革的時代，清末民初更是中國歷史上劇烈變動的時期。自從有了科舉以來，中國人讀書的目的就非常明確，常以「當官」為目標，長久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價值觀，讓中國的高等教育長期偏重文法科，而忽視農、工、醫…等的實科教育，造成文、實科比重嚴重失調，人才市場不平衡，進而影響中國在建設推動上經常面臨困難。

一九〇五年中國廢除已經實施一千三百年的科舉考試，開始推行新教育，這是中西文化衝擊下的產物，為了應付外力，期望用新教育抵制敵國，影響中國文化的演

¹⁵ 辛亥革命發生於 1911 年，自武昌起義爆發開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革命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結束中國長達 2000 多年的中國君主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中華民國。

¹⁶ 簡成熙，《教育哲學—理論、實務語文選》。頁 130。

進，不僅直接打破千年以來儒學的地位，也瓦解仕紳階層。科舉考試下的教育逐漸轉向新式教育，在考試內容、形式、標準上都發生了重大改變。

除此之外，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社會文化也正處於大變革的時代，新文化運動「反傳統、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以及文學革命運動，使得學術界開始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反對科舉制度的傳統舊教育，逼迫中國不得不向西方學習。民主主義蓬勃發展，在教育上亦是如此，民主主義強調從實踐中學習，反對傳統機械式的灌輸與訓練，在許多教育思想家當中，影響當時中國教育界、思想界最深的學者之一：約翰·杜威（John Dewey），他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不僅侷限美國，還影響全世界，也因胡適、陶行知、郭秉文、張伯苓、蔣夢麟都曾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因此將杜威的哲學思想傳入中國，並在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夕，杜威至日本講學的途中邀請他順道至中國展開為期十五個月的巡迴演說，使他的哲學思想在中國迅速被傳播，掀起杜威教育理論的熱潮，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與杜威教育思想相關的文章、翻譯出版了杜威主要教育著作，教育界也掀起了一場改革的浪潮，例如：教學法實驗、壬戌學制、制定教育宗旨、兒童中心課程、平民教育運動、提倡學生自治…等，都內容都蘊含了大量杜威教育思想的精神。

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引起全國反日反英運動，吳俊升被推為五卅慘案後援會主席，發動南京各學校團體一致的反英反日運動，並在《國家主義教育論叢》發表〈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認為國家主義的教育應由國家管理，在課程方面也應注重愛國主義。提出國家主義能夠發揚國民性、宣傳國家文化，國際主義能避免黷武窮兵與民族中心主義，吳俊升認為國際主義與國家主義應是相輔相成¹⁷。這也讓當時處於聯俄容共時期的國共兩黨從中看見了機會，在國共兩邊的推波助瀾之下，

¹⁷ 吳俊升（1983）。〈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文教論評存稿》，頁 223。

長時間被帝國主義壓制的人民開始反彈，中國逐漸邁入一個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狂飆的時代。

除此之外，民國成立十多年以來，國家仍無法統一，為矯正流弊國內部分教育學者開始感受到救亡圖存的重要性，當時的社會氛圍人民認為社會需要重建變革，國家主義教育思潮逐漸興起。國家主義教育思潮也逐漸影響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應發展個性與培養共性，但到了後期卻演變成只注重個人發展，忽略共性的培養，放縱利己，學者們開始反思新教育的自由反而走向極端的放任。且隨著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主政者體認到思想統一的重要性，經教育行政委員會通過，確定了黨化教育¹⁸的方針，強調黨化教育是革命化、人格化、社會化、科學化、民眾化與職業化的教育，逐步以「三民主義」融合中國教育系統。

貳、理論基礎

一、杜威的教育哲學學說

一九一九年初，杜威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演講，接到來自中國的邀請信，正是五四運動前夕，以北京大學、江蘇教育會、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浙江教育會、尚志學會，這五個教育團體作為主要的邀請的教育機構，邀請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至中國，持續兩年，足跡遍及在奉天、直隸、山西、山東、江蘇、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等省演講，並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正式授課。¹⁹把民主與科學的思想種子播種在中國。

¹⁸ 1927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制定了《學校實行黨化教育草案》，為中國推行黨化教育的開端。

¹⁹ 吳俊升，〈杜威在華演講及其影響〉，《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336。

杜威是二十世紀重要的教育哲學家，是二十世紀以來民主教育的領航者，更是教育哲學界最閃爍的巨星²⁰，不僅影響美國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教育理論影響全世界，尤其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他所宣傳的實用主義學說應合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需要，易於接受，一方面是批評中國文化和重新估量它的價值；另一方面對於選擇西洋文化以配合中國現狀。²¹ 就如杜威在教育與哲學關係的論述：「哲學是教育的普遍原理；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觀念自身並不是絕對的，杜威把觀念視為動態且具有工具性的指導效能，是一位折衷主義者，因為他調和了甚多哲學上對立的思想。²² 杜威的教育學說也因此成為五四運動時期思想文化界的一股熱潮，胡適曾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這樣大」。可見杜威對於當時中國教育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雖然杜威來華演講時，吳俊升還未進到南京高師學習，但當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匯集了許多杜威的信徒，如：郭秉文、陶行之…等人，都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與杜威是師承關係，南京高師也成為杜威學說在南方的重要活動基地。杜威透過演講、參觀考察、授課…等方式，以現代科學、民主、教育為主要內容，並結合政治哲學、社會哲學、教育哲學，說明相互之間密切聯繫的關係，其講演內容透過速記員記錄下來，廣泛發表於報章內，如：《平民教育》雜誌出了「歡迎杜威博士專號」、《新教育》雜誌於一九二〇年第三期出了「杜威專號」，他的演講被翻譯成中文，廣泛地發表在中國哲學和教育雜誌中。

吳俊升與杜威教育學說的接觸從進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起，除了上述提及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匯聚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徒外，他們使用的教材和教授的內容也多為杜威的

²⁰ 林玉体，《西洋教育史》。

²¹ 吳俊升，〈杜威在華演講及其影響〉，《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 337。

²² 杜威，取自教育大辭海：<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5816/>

思想，如：杜威的《民本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思維術》（How We Think）、杜威五大演講…等著作，對吳俊升都有至深的影響。²³

杜威處理知識問題的方法上，不同於傳統哲學家，他認為傳統哲學家把主體與客體、經驗與理性、理論與實踐、身與心之間畫出一條鴻溝，然後再用巧妙的辯證進一步掩飾它，一切的知識論因為在不民主的社會情況下形成，就有階級之分，每一階級有其特殊生活，也造就了特殊目的與特殊價值，就會有相互衝突的情況發生。因此杜威的知識論認為，傳統的普通哲學，尤其是涉及知識問題的哲學，只是當時社會情況的忠實反映而已。²⁴因此他折衷新舊教育不同的觀點，以包涵、調和各種意見，進而納入一有機體系，這些處理教育問題的主張，都直接影響吳俊升。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吳俊升於《大公報》「明日之教育」副刊發表《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²⁵一文，分別針對中國當時在教育上所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無論何種事業的實施都需要一項或數項最高的原則來作指導之看法，這種事業的進行才有一定的趨向，才有一定的方策。於是分別從教育目標、教育方法和教育制度的批評，來說明「哲學」的重要性。吳俊升認為當時過於偏重教育方法，忽略教育基本原理、方針及目標，教育理論和實施，紛紜變化，沒有重心，引起矛盾衝突、混亂和失去效力，進而提出補充意見²⁶。吳俊升認為在設定目標上，若無一種哲學根據，目標就會難以訂定，便會忽視目標，而只關心到具體可以做的，也就是只著重於教育方法與教育問題上，導致教育上的根本問題受到忽視。如果能先有一種哲學，明確的規定教育方針及理想，儘管有個方法與制度在當時是多麼的聳動，都應在選擇實行的方法與制度時，將不符合我們哲學的新方法或新制度剔除，選擇適合自己哲學的方式，鍥而不捨，必

²³ 程亮，吳俊升教育哲學管窺—以《教育哲學為中心》的考察，頁 84。

²⁴ 吳俊升，〈杜威的知識論〉，《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 259。

²⁵ 吳俊升，〈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1934 年 11 月，發表於《大公報》「明日之教育」副刊，收錄於《教育論叢》，頁 36-47。

²⁶ 吳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1976 年 5 月，台北：傳記。頁 64。

定能看到成效。回顧吳俊升的經歷與著作，其教育思想並非突然發生，而是對前人的教育哲學思想理論與其學習教育的歷程有關。

二、涂爾幹的教育社會學理論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是法國社會學派的領袖，他的四部巨著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社會分工論》、*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社會學方法的規則》、*Le Suicide : Étude de Sociologie*《自殺論：社會學的研究》、*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講述了他畢生的思想。涂爾幹認為社會是一種共同的精神，以社會學觀點講授教育學。當他在巴黎大學講授教育學的時候，就是站在社會學家的立場來講的，他的教育學說與社會學有密切的關係。²⁷涂爾幹將其社會學研究結果應用到教育學說，使得他的學說得著一個最堅固的社會學基礎。²⁸

涂爾幹主張教育型態會隨著社會的環境而改變，因為教育制度和社會制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²⁹涂爾幹重視理想社會的創建，認為教育是一種社會化的歷程，由成年人施予未成年人的影響，不同類型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教育，社會上有多種不同的環境，就有多種不同的教育，而這種教育便包含了民族特有的性質。除此之外，教育也會依時空而異，教育制度並無固定之實體存在，而且每個社會在其特定發展過程中，均有一套教育制度，此制度一方面對社會中的個人有不可避免的影響，另一方面它也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³⁰ 就如西方中世紀之前階級差異明顯，不同的階級接

²⁷ 詹棟樑，〈涂爾幹的社會教育學理論〉，《社教雙月刊雜誌》，頁 26-29。

²⁸ 吳俊升，〈社會學家涂爾幹的教育學說〉，《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 192。

²⁹ 梁福鎮，《教育哲學：辯證取向》，頁 39。

³⁰ 涂爾幹社會學思想。取自維基百科：<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8513/?index=5>

受不同的教育，現代社會階級逐漸消除，社會生活的型態比以前複雜，因此教育的多樣性也就更加顯著。³¹

透過社會與生活的分析，涂爾幹認為社會的發展是動性的變遷，生活形式或觀念並非由個人創造或決定，而是人類共同生活下的產物，且是集體意識所投射的認同概念。如果教育忽略了一個社會的本性，而隨意更張教育制度，其結果必定是教育失能或社會受了損害，也給了隨意移植別國教育制度者警醒。³²

涂爾幹的教育學說完全是他的社會學的應用，他應用他的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教育事實，為「教育社會學」奠定基礎，他應用他的社會學研究的結果來建立教育學說，為「教育社會學」找到了客觀的根據，「教育社會學」的目標和方法由他很明白的給確定。³³涂爾幹曾說：「教育僅是社會之影像與反映，教育模擬社會，以簡縮之形式再生社會，教育不創造社會——唯有社會自身改造，教育方有改造之可能。」因此，國家必須積極辦理教育，因為教育不僅具有集體功能，可使兒童適應社會，而且人類過去的歷史經驗更是各社會用以指導教育的基礎。教育不創造社會，唯有社會自身改造，教育才有改造之可能。³⁴

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

孫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理論包含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基本原理來自中國文化傳統、西方政治學與民主主義、資本主義、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再加上孫中山個人的理解與想像。³⁵ 三民主義並非三個孤立的主義湊合，而是以民族、民

³¹ 梁福鎮，《教育哲學：辯證取向》，頁 39。

³² 吳俊升，〈社會學家涂爾幹的教育學說〉，《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 179。

³³ 吳俊升，〈社會學家涂爾幹的教育學說〉，《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 191。

³⁴ 吳俊升，〈涂爾幹的教育學說〉，《社會科學年刊》，頁 5。

³⁵ 三民主義，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6%B0%91%E4%B8%BB%E7%BE%A9>

權、民生相互折衷權衡，把教育方法上的對立加以綜合，折衷社會與個人，綜合理論與經驗。民族主義教育的重點在於發揚民族精神，鍛鍊國民的體格，以爭取民族的生存和獨立自由；民權主義的教育重點，在於培育守法的精神，自治的能力，以建立自由平等的社會；民生主義教育的重點，在於養成勤勞的習慣，生產的能力，以發展國民生計，提高國民生活水準。³⁶

孫中山主張引進西方近代文化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與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國情民性相結合，使西方「物質文明」與中國「心性文明」相結合，以實現中西文化教育的匯合融通。³⁷ 孫中山認為西方近代文化固然重要，但應結合中國傳統文化，就如學習西方事物不應盲目照搬，應使中西文化融合，讓在現代化落後於西方發展百廢待舉的中國，可以在積極的培養下逐漸成長茁壯。一個社會的成訓教義，一個國家的憲令法章，都應為個人行為規範，猶如中國的傳統儒家學說，係以三民主義的社會哲學作為目標導向，三民主義三者不可偏廢，但也不意味三者同時重要，而是應視具體情況分輕重緩急，與時俱進，一面配合現在，一面適應未來。

吳俊升曾以〈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為題，主張教育實施需要一種哲學，雖然文中並未主張需要何種哲學，但卻引發當時許多學者關注並提出爭論，如：主張三民主義教育理論家姜琦以〈中國教育需要那一種哲學〉、〈中國教育的目標與方法〉以三民主義就是中國教育的目標回應吳俊升的問題，認為中國教育已有一種哲學，即是三民主義的教育哲學。吳俊升認為三民主義與中國傳統儒家學說兩者應當相輔相成，作為抗戰時期最好決定教育的目的，正如其在其教育信條一文指出：辦教育不可漫無目的，而所謂的教育目的又必須是為當前迫切需要的；不得已的辦法接受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的政治社會理想和體制所包含的價值系統，依此系統而推行

³⁶ 楊國賜，〈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現代教育思潮》，頁 293。

³⁷ 李立柱，〈吳俊升教育哲學思想研究—基於《教育哲學大綱》為中心的考察〉，頁 27。

出關於教育目的的信念。³⁸ 儘管抗戰成功，一九八五年時，吳俊升仍在其再版的《教育哲學大綱》一書發行五十週年後的渝版自序中提到，今後的中國教育哲學無疑的應該是以三民主義為基礎，演繹而成的一種系統，這系統的完成，便是今後中國研究教育哲學者的使命了。³⁹ 由此可見，三民主義最終也成為吳俊升教育哲學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吳俊升的教育思想由原來贊同杜威思想為主的自由、民主、國際主義的立場，逐漸的加以修正和補充，而兼顧民族文化的延續和愛國主義的提倡。杜威的教育理論、涂爾幹的社會學理論、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對於吳俊升的教育思想產生奠基的作用。



³⁸ 吳俊升，〈我的教育信念〉，《吳俊升先生暨夫人倪亮女士年譜》，頁 292。

³⁹ 吳俊升，《教育哲學大綱》，頁 5。

第三節 吳俊升的重要著作

吳俊升一生學習教育、研究教育，擁有實際從事教學、行政的經歷，其教育思想深受杜威影響，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是《教育哲學大綱》⁴⁰，不僅推進杜威教育學說的發展，也積極找尋適合中國的教育哲學，有「中國杜威」的稱號。本節將回顧其重要著作，探究其在抗戰時期所推動政策之關聯。

壹、抗戰前期相關著作

大學教育對於國家社會文化富有重大責任，但新式大學教育傳入中國後，對我國影響甚大。國民政府尚未頒布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前，大學亂無章法，馬虎湊合，高等教育無法培育人才，為社會增添諸多問題。中國教育宗旨無法確定，目的一再改變，甚至直接將戰勝國的教育宗旨套用在中國，教育思想格格不入，教育改革難以獲得預期效果，改革成效甚微。民國 14 年「五卅慘案」的發生，國家主義運動擴大，一般原本對國家主義尚持游移態度的人，至此也紛紛表示支持國家主義運動（陳啟天，1975）⁴¹。國家主義，是主張國家民族之統一、獨立、強盛為第一義，而至個人之死生、幸福、利益為第二義的一種意識形態。⁴² 吳俊升在《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⁴³ 指出在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後，開始學習日本帝國主義的尊君愛國；直到民國成立，為強化人民愛國意識，實行軍國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代表國家主義的德國一蹶不振，國家主義受人詬病，直到國內戰禍頻仍，國際壓迫，國家主義才又漸受重視。國家主義的教育，讓國家管理教育，收回教會教育權，制定統一的教

⁴⁰ 吳俊升，《教育哲學大綱》，1935 年 1 月，上海：商務，列入《師範叢書》。1935 年 3 月再版，經增訂改歸《大學用書》。除了是教育哲學入門教科書外，也是早期的考試用書。

⁴¹ 陳啟天，〈近代中國國家主義運動小史〉，《世界國家主義運動史》，頁 55。

⁴² 朱經農，《近代教育思潮七講》，頁 55。

⁴³ 吳俊升，《國家主義的教育之進展及其評論》，《教育論叢》，頁 223-238。

育政策，確立國家教育系統；在課程方面發展能夠注重愛國教育。吳俊升認為國家主義的教育在中國是可行，但仍必須注重兒童的個性，否則機械式的教學或訓練，將造成許多國家的機器，而不能自由思想的國民，都是國家主義走向極端時可能造成的罪惡。

因此吳俊升在《大公報》的教育副刊發表《重新估定新教育的理論與實施的價值》⁴⁴一文，首先將新教育的「重自由、重實行、重興趣、重現實生活」四大原則，就其理論和實施方面與舊教育「重權威、重理論、重訓練、重將來生活」比較與檢討，進一步從自由主義應以權威紀律為界、興趣主義仍須藉努力成為行動動機、實用主義應輔以為學問而學問，為將來生活充實現實生活。反對矯枉過正，主張新教育與舊教育應是程度上的差異，並非是非絕對，否則新教育將陷入舊教育的極端，教育應隨實際的狀況折衷互相平衡，如此才是理想的教育。

在當時的中國，對於「新教育」這個抽象的名詞，不同學派有著不同的解釋，充斥了各種教育思潮，吳俊升鑑於當時教育的理論和實施，紛紜變化，因此在《大公報》發表《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⁴⁵，首先指出中國舊教育重視目標忽視方法，如今卻因為講求教學方法忽略教育目標，這是因為缺乏哲學根據，忽視教育的根本問題，所以忽略教育要教什麼。除此之外，他更指出長期以來，教育界鑽研教育制度與方法，中國卻仍無法找出適宜的制度與方法，這也是因為缺乏哲學作為指導原則的緣故。吳俊升檢視當時的社會現況，認為中國需建構屬於中國的教育哲學，作為一切指導的原則，而這些原則需仰各領域專家，對於中國過去的文化和現代的需要做綜合考察，找到一種普通的哲學作為教育的基礎，最高的指導原則，否則易引起矛盾衝突與混亂，使教育失去效力。此文發表後，引起一場爭鳴，在當時國共內戰以及民族救亡

⁴⁴ 吳俊升，《重新估定新教育的理論和實施的價值》，〈教育論叢〉，頁 1-35。

⁴⁵ 吳俊升，《中國教育需要一種哲學》，〈教育論叢〉，頁 36-47。

圖存的社會氣氛之下，這場教育學上的論辯，最後終以一種救國主義式的教育哲學做終結⁴⁶。

在嚴重的國難期間，吳俊升則在《大公報》發表《論國難期內的教育》⁴⁷，認為若要以教育救國，首先必須要認清教育的效能與限度，因為單靠教育獨當救國的重任是難以達到效果的，教育必須要與國家其他力量合作，除此之外，教育的改變是迂緩的，難以在短暫的時間內有重大的改變。因此在國難期內的教育，不應該只是在原有教育而外，另加一部份的特殊教育，而應該是全部貫徹救國目的的教育。也不應只是應付一時非常局面的教育，而應該還是應付「來日大難」的教育。有鑑於此，吳俊升提出教育救國的四大方向，全國效忠民族為最高理想，統一國民理想對外才能產生一致的力量；普及義務教育，才可使人民對國家產生國家意識，建設心理上的國防要圖；實施青年訓練，訓練有堅強的體魄，貞固的品格；整頓人才教育，在培養人才的中學與大學，針對課程、學額與教學方式進行改善。吳俊升在《教育生涯一周甲》當中提到當時陳立夫部長透過這篇文章任命他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1938-1944），此篇論文對當時停止平時教育改辦戰時教育發生了平衡的作用，並對抗戰時期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發生影響。

吳俊升關注國內教育，除了紛紛在報章對於中國教育情況進行反省與建議外，他在北京大學任教滿五年後，利用帶薪休假期間赴美考察教育，因為當年的中國效仿美國的教育制度，施行新學制，藉此機會到美國了解新教育實際實施的情形，提供中國借鑑，且北京大學講授教育哲學亦是以杜威學說為中心，吳俊升又深受杜威學說的影響，因此藉此次考察，吳俊升對於杜威學說與新教育運動有偏差的地方，當面向杜威請教，並和美國實際情形相印證。吳俊升赴美不僅參觀了許多中小學，發現大部分的

⁴⁶ 吳美瑤，〈待完成的哲學體系—重建 1934 年到 1937 年中國教育哲學發展史上的一段論爭〉，《教育研究集刊》，頁 43。

⁴⁷ 吳俊升，論國難期內的教育，《教育論叢》，頁 128-132。

學校都受到杜威新教育理論的影響，也到杜威的寓所會見他，並請教其「在中國受帝國主義侵略情形之下，教育上應該注重世界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的相關問題，增強吳俊升對於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教育信心⁴⁸。吳俊升回國後，除了將此趟教育考察撰寫成《杜威先生會見記》出版外，內容亦紀錄期第一次在法國與杜威會晤的內容。

貳、與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相關著作

抗戰時期吳俊升在其著名的《教育哲學大綱》增列〈渝版自序〉，他試圖釐清中國教育哲學的問題，找出適合中國的教育哲學。任何時代的教育思潮，都反映著當時的社會背景、時代思潮，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不同理想進而產生衝突。吳俊升認為這是一場極權主義與民治思想的戰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軸心國與同盟國以不同的教育理想與作為，養成不同的人民性格。軸心國的集體主義，重視群體、組織與紀律、意志的鍛鍊、謳歌戰鬥；同盟國則是民治主義，重視個體、個性與自由、智慧的啟發、愛好和平。因此在戰爭發生後，實施的教育成果將再被檢視。儘管同盟國在此次戰爭獲得最終勝利，但仍須檢討民治主義教育的缺點，例如：組織鬆懈、行動迂緩、過於重視個己缺乏犧牲的精神。因此吳俊升認為民治主義並非一無缺失的，實施時仍須注重紀律、組織、義務、克己、犧牲的觀念。

在中國，儘管教育宗旨屢有變更，時而提倡軍國主義，時而提倡民主主義，時而提倡社會主義，時而提倡國際主義，可是中國主張效忠國族的「愛國主義」卻是始終沒有改變的，這與當時教育德國重權威、重民族國家利益、重訓練…等的教育理念頗為相像，但因為德國在兩次的戰爭中都以失敗收場，反觀美日卻在戰爭中成為贏家，經濟亦迅速發展，國際和平主義便成為中國極力想模仿的對象，因此改變了一貫的教育方針，對內變為崇尚個人自由，對外則憧憬於國際主義，以致從民國7年到16

⁴⁸ 吳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頁72。

年間學風大變，對內紀律鬆弛，不能成為有組織的國家；對外則幻想和平，成為精神上和物質上解除武備的國家（吳俊升，1943）。這樣的狀況直到國民革命後才漸漸矯正過來。⁴⁹ 但朝令夕改的教育方針，仍使中國教育無所適從，因此吳俊升認為主政者必須檢討過去，且擁有預測未來的能力，尤以在烽火連天的戰亂中，必須外觀世變，內審國情，才能建立正確的教育哲學，作為教育實施的方針。

教育上各種主義的產生都與社會背景、時代思潮、先知先覺之士有關，因此，吳俊升認為今後的中國教育哲學應以國父孫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義為基礎，他曾發表《論三民主義教育的綜合性》，指出教育應隨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原則，三民主義並非三個孤立的主義湊合，而是以民族、民權、民生相互折衷權衡，把教育方法上的對立加以綜合，折衷社會與個人，綜合理論與經驗。如：民族主義權衡民權主義，不致流為極權主義；民族主義權衡民生主義，不致流為國家資本主義；民權主義權衡民族主義，不致流為放任的個人主義；民權主義權衡民生主義，不致流為資本主義；民生主義權衡民族主義，不致流為國際主義；民生主義權衡民權主義，不致流為共產極權主義。⁵⁰ 由此可見，教育理論的實施上，社會與個人各有偏重，易產生對立，但若能實行三民主義的教育，他便能在偏重社會與個人的對立獲得綜合，三民主義的教育可謂表現了兼容並包的綜合性。

⁴⁹ 吳俊升，《教育哲學大綱》，頁4。

⁵⁰ 吳俊升，〈論三民主義教育的綜合性〉，《文教論評存稿》，頁132-133。

第三章 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發展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先概述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芻議，第二節高等教育制度的分歧與建制，第三節則是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任務。

第一節 改進中國高等教育的芻議

舉凡古今中外，歷史上的戰爭或軍事衝突不計其數。二十世紀初，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是帝國主義掠奪的戰爭，目的即是讓中國滅亡，統治中國人民。日軍入侵中國後，計劃在三個月內結束中國事變，因此中日戰爭初期的戰況對國民政府而言是相當不利的，中日大戰展開不到半年中國已折損掉大部分現代化的作戰部隊，急需補充與整頓。⁵¹ 由於中日兩國國力與軍力相差懸殊，國難當頭，教育界在教育改革認識的基礎上，對於教育與國家危亡的關係，進行了許多論述，有部分人士認為應從培育抗戰建國人才開始，因此戰時教育取向認同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本章節將針對徹底改革派、改革充實派進一步分析探討。

壹、徹底改革派

一、張申府⁵²

張申府七歲就開始讀書習字，且接受傳統的儒家教育，一九〇六年近到北京求學，開始接受現代知識教育，一九一三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隔年考入文科哲學系，後轉入理科數學系，熱衷於數學哲學，曾在北大、清華等多所大學任教，有「中國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哲學專家」的美譽⁵³，一九一九年積極參加五四運

⁵¹ 陶涵，《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頁 166。

⁵² 張申府（1893-1986），原名崧年，字申甫，生於直隸（河北省），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愛國知識份子、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曾經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大學任教，積極投身五四運動。

⁵³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頁 162。

動，一九三五年參與組織了一二九運動，曾在抗日戰爭時期擔任全國戰時教育協會理事，經常利用講壇宣傳愛國主義，投身抗日運動，並且參與戰時教育討論的熱潮中，曾在《大公報》、《戰時教育》…等報刊發表文章，闡述自己戰時教育思想的主張。

張申府認為要改革現行教育施行抗戰教育，就必須先瞭解現行教育的弊端。因此他認為中國受列強侵略，面臨民族危機，施行的教育不符合社會的需要，必須打破現狀才能有所進步，並提出現行教育的四大弊端：「掏空、脫節、畸形、忘本」⁵⁴。指出教育只重視智育及書本的背誦，忽略讀愈發展，教材內容與現實生活脫節，難以把知識實踐到生活上。除此之外，學校各自為政，各級教育缺乏通盤規劃無法連貫，使得城鄉差距拉大，教育只在城市發展，難以顧及鄉村地區，導致中國文盲數居高不下，文化水平仍舊低落，儘管教育當局效法歐美地區的現代教育，提出改良的措施，卻僅僅照單全書，沒有顧及中國傳統，使得教育成為一種沒有目的、沒有理想、沒有哲學的教育。

張申府也曾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五日與教育界人士一同致電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教育部、各級學校…等，針對目前中國的教育現狀，向全國上下提示一緊急建議：立即實施抗戰教育。⁵⁵「全國蒞漢教育文化界要求實施抗戰教育快郵代電」一文指出惟有做出改變，才能共挽危局，因此提出以下三點當前中國教育的問題及改進：第一，必須根據抗戰需要建立三民主義革命的教育系統；第二，必須改造學校教育機構，將原本以校舍為主體的死學校，改為有組織的活團體，以適應戰時狀態；第三，學校課程必須裁撤無用功課，以民族解放的政治教育為基礎，以抗敵的遊擊戰鬥為作用，在這中間發展抗戰的組織教育、技術教育、文藝教育。張申府主張抗戰時期的教

⁵⁴ 胡門祥，〈論張申府的戰時教育思想〉，《教育評論》2007年，第5期，頁115-118。

⁵⁵ 擷取自〈全國蒞漢教育文化界要求實施抗戰教育快郵代電〉，節錄於武漢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主編《武漢文史資料》，1998（3），頁154。

育方針，應以服務抗戰、培養戰時需要的人才，也就是戰時的教育要兼顧抗戰與建設，學校需要改變而非廢除，大學應該為研究性質，並提供國家社會需要。

二、毛澤東⁵⁶

毛澤東自八歲進入私塾，接受儒家傳統教育，求學的歷程時輟時學，一九一〇年時，進到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學習，並接觸維新派的思想，在十三歲時曾輟學務農，對農民疾苦的生活有所體會，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毛澤東投入革命軍，並在兩年後，先後考入湖南全省立公立高等中學校及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院，並在此畢業。

參與革命活動對於毛澤東的影響極大，他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且組織共產主義小組。在創立中國無產階級教育事業的實踐中，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合中國革命和經濟建設的實際對教育領域不斷進行改革，從而建立起一個被世人所矚目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無產階級教育體系。⁵⁷

西安事變後，國共被迫合作聯合抗日，在一九三七年中國共產黨蘇區代表會議中，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內容主張「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顯然對於毛澤東而言，各項措施都應該適應抗日的需求，為國防準備。除此之外，毛澤東亦在《抗日建國十大綱領》⁵⁸中提出抗戰具體的十項內容，包括：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施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實施全國人民的總動員、改革政治機構、執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執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改良人民生活、執行抗日的教育政策、肅清漢姦賣國賊親日派、促成抗日的民族團結。

⁵⁶ 毛澤東（1893-1976），字潤之，生於湖南湘潭，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的重要政治家與思想家，指導中國軍事戰略與外交。

⁵⁷ 白云，〈毛澤東教育改革思想對高等教育創新的啟示〉，《教育探索》，175，頁9。

⁵⁸ 《抗日建國十大綱領》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於1946年1月16日政治協商會議上提出。

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及《抗日建國十大綱領》的內容皆指出，毛澤東認為應該改進不合現況的教育，實行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教育。民族存亡的抗戰時間，教育不可廢置或停辦，徹底改革派認為國難臨頭，應配合戰時需要，徹底改革，打破過去教育腐化的體制與內容，根本推翻。

貳、改革充實派

一、雷沛鴻⁵⁹

雷沛鴻在一九〇五年考入兩廣高等工業學堂修讀化學，隔年加入中國同盟會⁶⁰，是一名著名的教育理論家，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信奉三民主義。早年留學歐美，一九一三年赴英留學，隔年則赴美就讀密西根大學，並在歐柏林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後至哈佛大學攻讀文科博士學位。返國後，雷沛鴻擔任過許多教育相關職務，根據曹又文〈論雷沛鴻的愛國教育思想〉⁶¹，可以將雷沛鴻的教育思想歸納為三類，內容又以愛國思想貫穿其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進行論述：在政治上主張救亡；在經濟上救窮；在文化上救愚，而教育的首要目的便是為了抗戰救國服務。

雷沛鴻認為教育在抗戰的重要性僅次於戰爭和生產，不容忽視，尤其中國當時面臨內憂外患，因此主張在實踐教育之前，個人的生活必須要先得到保障，如此個人才能夠與國家聯繫起來，人民才能將國家存亡放在首要位置。雷沛鴻認為教育應隨時空而有所調整。因此在抗戰時期，戰爭與生產所直接需要的知識與技能應該重於一般教育，如此在物質上與精神上才能夠支援抗戰救亡，亦能觸及未來的物質及精神文化。從遠

⁵⁹ 雷沛鴻（1888-1967），字賓南，乳名壽增，曾任廣西左江師範監督、南寧府中學堂校長，赴英美留學回國後，擔任過廣西省長屬教育科長，創辦國民中學、廣西普及國民基礎教育研究院，也曾擔任廣西大學校長、廣西教育研究所所長…等職務，並發起大規模的教育運動，對於廣西地區教育發展貢獻極大。

⁶⁰ 中國同盟會亦稱中國革命同盟會，一九〇五年成立，由清末的革命組織，如：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團體組成，由孫中山、宋教仁、黃興、蔡元培等人領導，最終成功推翻滿清，在辛亥革命後建立共和政體，是中華革命黨及中國國民黨的前身。

⁶¹ 曹又文，〈論雷沛鴻的愛國教育思想〉，《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處大處著眼，從近處小處著手，由下而上施工，戰時教育應將抗戰時的短期目標與抗戰結束的長期目標相互結合。

綜觀雷沛鴻一生，他除了致力於國民教育的實驗研究與普及的工作，同時也重視高等教育的理論探討與改革試驗，為了改良中國高等教育不適應社會發展的情況，雷沛鴻創建西江學院，在《創設西江學院建議書》中指出：「吾人願在高等教育方面作一個嘗試，相謀創設此一高等教育組織於吾國西南方之一個曾經國際戰爭有名的都會」欲平衡長久以來教育分佈不均的問題，因為雷沛鴻認為「教育為建國大業之根本要圖」、「建國有道，教學為先」⁶²，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密不可分，教育應普及化，才得應付建國大業之迫切要求。由此可見，雷沛鴻認為雖然國難當頭，但仍必須透過教育救國，不論在國家建設或是地方建設，都需要透過高等教育培養抗戰與建國併重的專門人才。

二、馬宗榮⁶³

馬宗榮於一九一八年考取貴州公費留學，赴日學礦，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攻讀社會教育與圖書館學，返國後持續從事社會教育，曾擔任教育部簡任秘書及社會教育司司長，並在大專院校擔任教授，於上海大夏大學擔任圖書館長時，為大夏大學創辦社會教育系，對於民眾教育的發展不遺餘力。

馬宗榮認為當時中國的教育出現了許多問題，主因為教育無法落實於全國人民，導致國民智之愚淺，民眾的道德素養低落，他透過對美、英、德、日等國社會教育的考察，結合中國實際，把他的社會教育思想建立在全民基礎之上，主張教育機會均等，並且積極推廣民眾教育。

⁶² 周川，《百年之功——中國近代大學校長的教育家精神》，頁 510。

⁶³ 馬宗榮(1896-1944)，字繼華，生於貴州省貴陽縣，中國近代留日學習社會教育理論之學生，主要以社會教育的理論和實踐相互結合並作為研究，自成一套獨特的社會教育理論。

全面抗戰後，馬宗榮至貴陽、重慶持續推展民眾教育工作，認為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之教育及工作計畫，不但不能停止，更應從多方面設計，多方面著手，不宜固執某種主張⁶⁴。馬氏的教育理念不僅培養國民民族主義，更是強調抗戰乃為民族抗戰，教育應繼續且徹底實施。

戰時教育在抗戰時期雖然出現了許多不同的聲音，有支持戰時教育平時化的，亦有支持全面改辦抗戰教育的，即便看似相互對立，但經由文獻的考察後，發現對於戰時教育的看法，僅是大變與小變之別。提倡徹底改革派的主張改組或是停辦一般學校，將與戰事無關的學子送上戰場，直接協助抗戰；提倡調和折衷派，則是延續教育，但學校仍應為抗戰需要調整或增加學習的科目，間接協助抗戰。因此不論徹底改革派或是調和折衷派，都將高等教育視為抗戰與建國的基礎，豐富了戰時教育的思想與實踐，對於戰時教育方針的爭論，卻也成為當時國民政府亟需處理的問題。



⁶⁴ 馬宗榮，〈今後的高等教育問題〉，《教育雜誌》，28(4)，頁 1-9。

第二節 高等教育制度的分歧與建制

抗戰時期教育改革的呼聲不斷，人言各殊互不相容的情形動搖整體教育環境，唯有確立戰時教育政策才能穩定學校教育環境，才能讓教育在抗戰時期持續發展。本節將針對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制度確定的過程、政策內涵、及制度確立進行分析整理。

壹、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制度之確定過程

教育政策制定之前，必有教育問題的產生，教育待處理的問題即是教育政策形成的基礎。在抗戰前期國民政府對於教育不能給予徹底的改造，導致教育問題甚多，除了國聯教育考察團已針對當時的中國教育現狀提出了許多建議外，有許多教育專家學者亦對中國高等教育提出了待改善的問題，如：程其保在一九三二年在《我國大學教育之估計》⁶⁵一文曾指出中國數十年來大學教育發展需要改進之處，包括：大學分佈不均；公立大學數量甚少，私立大學品質良莠不齊，科系以文法商為主，缺少實科教育；學生入學與畢業沒有嚴格的標準，缺乏競爭力，導致畢業即失業；學校的課程過於細微，基礎教育反而被忽視；大學教授資格鬆散…等問題。在高等教育長期分科以來，各種教師所受訓練相異，立場亦復有異，難免在教學上也有所不同，教育效力不如預期，亦因學校無整體計畫的緣故，為使青年成為健全公民，在各種教學上，應主張統一目標，才能把過去分道揚鑣的風氣，掃除淨盡。

除此之外，蔣介石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提出，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國民的知識水準就應該提高，並指出：「我們在各部門中需要有若干萬的專門學者，幾十萬乃至幾百萬的技工和技師，更需要幾百萬的教師和民眾訓練的幹部，這些

⁶⁵ 程其保，《我國大學教育之估計》，引自胡金平〈權利與權力的博弈：1930年代「整頓大學」引發的學術論爭論〉，擷取自：http://www.sohu.com/a/298835535_387114

都是要由我們教育界來供給的，這些問題都要由我們教育界來解決的。」⁶⁶由此可見，人才缺乏，失業人口多，顯示出人力資源的供需失衡，最大問題乃是育才制度與方法未能適應社會需求與國家需要，這些都必須歸咎於國家在教育上沒有通盤計畫所造成的結果，所以在全面抗戰時期，有系統、有步驟的高等教育是勢在必行的。

教育學者針對教育問題指出原因，在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國家面臨危機之際，教育界專家針對戰時教育方針的問題展開論戰。有的主張調整現有學科，開設與抗戰服務相關的課程；有的主張改組和停辦與抗戰無關的高等教育學校；有的主張改革現有學制，實施全民教育和自修教育；還有的建議學生走出教室，直接參與前線或者後方抗戰服務。⁶⁷但教育是百年大計，茲事體大，不應草率將事輕易決定，而是應該要納入國內的經濟狀況、社會背景、政治發展…等，進行全盤的考量，否則新制度難以發揮預期效果。

中國是幅員廣大的國家，蔣介石在盧溝橋事變後五天已看清大局，定這場戰爭非至萬不得已不宣戰⁶⁸。因此蔣介石提出二期抗戰方針，隨後在一九三七年底發布《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⁶⁹，表示持久戰若要建功，就必須仰賴全體國民共同為經濟與國防建設努力。國力基於文化，支持文化的教育，從縱的方面講，自小學、中學、大學以至研究所，缺少一段就無從實施；從橫的方面講，無論文法數理工農醫商，都是一套整體的配合，缺了一體都將影響整個國家的結構。況且文化是有機體，他的生命不可中斷，所以不但大學不能停辦，就是義務教育夜不能停辦，而且要積極擴充。⁷⁰可

⁶⁶ 教育部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紀錄》，頁 6-7。

⁶⁷ 金以林，《近代中國大學研究》，頁 151。

⁶⁸ 呂芳上，《民國史論》，頁 1445。

⁶⁹ 蔣中正，《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取自：<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6%88%91%E8%BB%8D%E9%80%80%E5%87%BA%E5%8D%97%E4%BA%AC%E5%91%8A%E5%85%A8%E5%9C%8B%E5%9C%8B%E6%B0%91%E6%9B%B8>

⁷⁰ 羅家倫，《文化教育與青年》，頁 185。

見文化與教育對於國家持續發展顯得格外重要，因此抗戰時期的教育方針、教育政策的制訂，考驗執政者。

面對紛雜的意見，國聯教育考察團的報告書亦對國民政府教育改革的決策產生了極重要的影響，針對非常時期的教育之看法，國民政府認為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且教育是政治中的一環，絕不是與政治對立的，為達到理想的結果，國民政府在教育、經濟、軍事、財政上向一個中心目標進行，依各需要，設機關經營由專家辦理，促使整體能共同達成目標。蔣介石以持久戰為爭取最後勝利，計畫教育以配合抗戰建國需要，整合教育、經濟、財政、軍事，使其目標統一一一致，並教導兒童、青年成為健全公民。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要要先強化與控制青年學生的教育，並獲得有志青年的支持，因此在教育政策的擬訂上，進一步對人力資源進行全盤的計畫。

抗戰時期教育政策的制訂及決策過程有賴於教育部，抗戰時期的教育部長為陳立夫⁷¹，全面抗戰八年間期間，同時又陳立夫擔任近七年的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亦是目前為止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陳立夫曾擔任採礦工程師，原志不在政治，但因其兄陳果夫請其協助，並在北伐前夕受到蔣介石重用，因而棄公從政，也由原先的黨務工作轉任教育，在陳立夫上任前，中國教育體制陷入一片混亂，在面對重大問題的解決、繁雜的政策推動中，除了須憑藉有力人士的指示與支持外，人事任用亦要安排得當，部務才能順利進行，因此人才的選用便格外重要，必須有周全的考量。

陳立夫選任一九三七年結束在美國考察教育回國的吳俊升為全面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司司長，主要根據其過去對於教育界的言論與成績、經驗，在陳立夫《成敗之艦》一書中，提到選任吳俊升的原因是在他〈國難期內的教育〉一文，吳俊升對於戰

⁷¹ 陳立夫(1900-2002)，北洋大學礦科畢業後，赴美國匹茲堡大學工讀冶礦學碩士，棄工從政後曾擔任蔣介石的機要秘書、中央黨部秘書長、立法院副院長…等職務，並於1938年1月7日就任教育部長，直到1944年12月去職。

時教育早有其見解，在區域性上，對南方及北方的教育都曾經歷過，較了解南北兩地的高等教育情形，且其對於教育政策的意見與陳立夫也較為貼近吻合，因此選任其為高教司長，並展開戰時教育一連串的改革。

陳立夫贊成吳俊升的主張，仍認為教育是百年大業，不應隨政治擺盪不定，而是應該「注意十年後所需人才⁷²」，提倡抗日與建國應並進，一面建國，一面建民，便是其主張的戰時教育方針。在戰時教育政策上，陳立夫認為應將抗戰與建國併重，並於《告全國學生書》⁷³中表示，抗戰是長期的，應該持續不斷的培養人才，且教育不應該孤注一擲、瞬息萬變，並反對實施戰時非常教育的建議，主張戰時教育不可廢棄正規教育，而是要增加其質與量，不應與平時而有差別，這便是其主張戰時教育平時化的原因⁷⁴。陳立夫所提出的戰時教育政策與高等教育息息相關，並多是依戰前缺失而提出的改進，在擔任教育部長的七年期間，撫輯流亡學生，重振後方弦歌，擴展各級教育，改革並建立制度，發揚民族文化，訓練並徵調學生直接參加抗戰工作⁷⁵，才能使中國教育並沒有因為戰爭停頓不前，反而讓戰時教育有相當大的發展。

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的擬定與推動上，主要由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負責，他上任後認為抗戰與建國需兼顧，為了準備建國人才，主張高等教育不能停辦，國難期間所需要的教育，不應該只是在原有教育而外另加一部份的特殊教育，而是應該是全部貫徹救國目的的教育；也不應該只是應付一時非常局面的教育，而應該還是應付「來日大難」的教育⁷⁶，為確定中國抗戰建國的教育政策，以利教育在抗戰時期能正常且朝抗戰勝利發展，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於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並於同年四月一日通過制訂「抗戰建國綱領」，此為全

⁷² 陳立夫，《撥雲霧見青天》，頁 287。

⁷³ 陳立夫，〈告全國學生書〉，《教育通訊》，

⁷⁴ 陳立夫，《撥雲霧見青天》，頁 288。

⁷⁵ 陳立夫，《成敗之艦》，頁 235。

⁷⁶ 吳俊升，《教育生涯一週甲》，頁 66。

國一致遵守的準則，不論外交、軍事、經濟、政治、民眾運動、教育都須遵循，為中國充實抗戰力量，希望人民能夠集中意志，放下成見，統一行動，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為骨幹，共同擔負抗戰建國的使命。在抗戰建國綱領中，揭示兩大總則：一、確定三民主義和國父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二、全國抗戰力量應在中國國民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奮勵邁進。綱領的第一項，指出國家教育的最高原理，必須以三民主義為真諦，務使知識、道德，所有教育遵循於三民主義的國民道德，養成國民之生活技能，增進國民生產能力為主要目的。

在兵荒馬亂的戰爭中，國民政府在教育上以三民主義為方針，不僅指引了教育教育的目標，也獲得全國各黨派的支持與贊同，穩定當時紛亂的教育環境，同時從事全國各項的抗戰的教育，成為中國抗戰建國的最高指導原則，為建國奠定良好基礎。

貳、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之政策與內涵

全面抗戰時期，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四大教育綱領及「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訂定了最高指導原則，確定了中國抗戰建國的教育政策，內容包含：一、改訂教育制度與教材，推行戰時教程，注重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之研究與擴充其設備；二、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予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三、訓練青年，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能量；四、訓練婦女⁷⁷。其中，又以前三點與全面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最為相關。藉由釐定有利抗戰、益於建國的教育制度，為此提出了以下救國方案：一、教育理想的確實和統一；二、普及義務教育；三、實施青年訓練；四、整頓人才教育。顯然高等教育在抗戰時期肩負國運勝衰，因此需要加以重視。改善了中國過去因模仿外國教育制度，以致不合中國需要的問題；在教學內容上，過去的教材難以達到學以致用的原則，以致受高等教育的畢業學生學非所用，

⁷⁷ 陳立夫，《戰時教育行政回憶》，頁11。

造成人力不足、國家資源浪費的窘境，因此根據確立後的抗戰建國綱領，編訂符合中國民族的需要、符合中國環境、事實的教材，才能使教育能適合戰時的需要。

然而教育亦是政治中的一環，政治包含軍事、經濟、教育…等，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在中國教育體制陷入混亂的時期，指出教育抗戰是長期的過程，不容許將人才孤注一擲，而必須持續培養人才；國防的內涵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不是必須培養的基本知識，就是造就各門技能，均有其充實國力之意義。⁷⁸

全面抗戰前，針對高等教育應維持什麼樣的教育，以及培養通才或是專才的問題，朱家驊整合教育界專家及大學校長的建議，在《九個月來教育部整理全國教育之說明⁷⁹》一文中表示，教育應注重民族復興，才能厲行整理與改革全國教育，然而高等教育是研究教育的地方，必須由基本而專門，做有系統的研究，尊重學術體系，專深之學，應可由學生自力研究，不必慮其深之不窮，而紛紛設置各種專門問題的課程。這樣的建議，也成為後續高等教育課程修訂之中。

抗戰若要勝利，除了要爭取民族生存外，亦要趁此機會改造民族、復興國家，使中國成為現代化國家，因此蔣介石在陳立夫所主持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⁸⁰表示若要完成上述目標，都有賴於教育界供給與解決目前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在抗戰建國期間，政府為持續推動教育，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中，教育部根據「戰時各級教育實施綱要」，擬定「抗戰建國時期教育實施方案」，其中內容含九大方針：一、三育並重；二、文武合一；三、農業需要與工業需要並重；四、教育目的與政治目的一貫；五、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密切聯繫；六、對於固有之文化精神所寄之文史哲藝，以科學方法加以整理，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對於自然科學，依據需要迎頭趕上，以應國防與生產之急需；八、對於社會科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對其原則應加整理，對於制

⁷⁸ 張在軍，《西遷與東還》，頁49。

⁷⁹ 王聿鈞、孫斌，《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131。

⁸⁰ 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於重慶召開，並由教育部長陳立夫主持。

度應謀創造，以求一切適合於國情；九、對於各級學校教育，力求目標之明顯，並謀各地平均之發展，對於義務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達普及，對於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力求有計畫之實施。

教育部另依據上述九大方針，進一步訂定十七項實施要點及具體措施，以及施教對象，以為抗戰時期辦理教育所應遵循的準則，乃是戰時教育實施的最高依據，這亦是陳立夫在抗戰時期主張不能廢除正規教育，更要強化教育，抗戰時期教育應平時化的原因。因此根據戰時教育平時化的決定，對於各項教育做了具體的規定，讓抗戰時期分歧的教育主張作了具體的規定⁸¹。確定高等教育的政策，才能穩定教育環境，維持正常教育的進行；才能奠定抗戰建國人才培育的基礎。其中與高等教育內容關的規定包含：現代學制的維持與變通、學校遷移設置的通盤計畫、師資訓練、各級學校教材和教學科目的整理、訓育標準的訂定、體育教學鍛鍊青年體魄、嚴格教育管理制度、教育經費的籌措和增加、教育行政機構完善的設備及功能，以及全國最高審議機構之設立以提高學術標準。

抗戰時期戰火迅速蔓延，中國教育歷經日軍轟炸，教育事業屢遭摧殘破壞，但政府仍本著抗戰與建國並重的原則，教育事業不僅沒有停擺，反而更積極推展各級教育，期望透過教育培養國民效忠國家的愛國精神，以及維持民族生存發展必要的理想與知識，實施「戰時教育」。戰時教育即是抗戰期間所實施的教育，一面針對抗戰與建國的需要增強武力、培育人才，一面改革過去教育的缺失，以為來日大難做準備。

⁸¹ 張珊珍，〈陳立夫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教育〉，《抗日戰爭研究》，頁 92-93。

參、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制度的確立

一九三八年在日軍的破壞下，國家局勢危殆，有半數高等教育被轟炸的殘破不堪，教育幾乎停頓，中央政府經費緊縮，大量流亡的學生應如何安置與救濟及費思量。高等教育是學潮的領頭羊，因此國民政府首先從整頓高等院校開始，國民政府成立以前，高等教育中的國立大學、學院、專科學校是由教育部直接主辦，省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則由省及私人團體分別遵循大學法、專科學校法及有關規程處理校務。因此高等教育機構常有重複設立、學風散漫不合標準的情形，教育部雖曾加以整頓，但因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戰爭爆發，不只未能有效改進，且遭逢了極大的危機。

國父孫中山說：「革命的基礎在於高深的學問。」足見知識就是力量，人才的培育應配合國家需要，修養高深學問，發展個人才能，國家建設才能順利進行，並在抗戰時期救中華免於崩塌。且在當時，中國的高等教育並不發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達的國家，相差甚遠。

吳俊升認為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之計，且評估當時無立即徵調大學生投入戰場之必要，主張原有教育必得維持，決定提出以「戰時作平時看」為辦理方針，否則後果將更不堪。國民政府是全面抗戰時期領導中國從事抗戰建國者，亦要肩負抗戰建國的使命，在紛亂的環境中為集中全國人民意志，必須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戰。高等教育包含專科學校、獨立學院、大學，一九三八年，陳立夫就職後便宣布今後教育實施的方針，便於一九三八年三月發表「告全國學生書」⁸²。正式昭告青年有志從軍者，政府可加以安置，其大部分青年願意留在學校者，應遵從規定，接受正規教育與適應戰時需要的特別訓練。⁸³說明教育政策，指示青年趨向。

⁸² 陳立夫，《成敗之鑑》，頁 243。

⁸³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11。

戰事發生後，華北及沿海沿江一代，是大學、學院、專科學校最密集的地區，去因日軍轟炸，相繼淪陷。根據教育部一九三九年統計，戰前專科學校共一〇八校，因戰爭遷後方者有五十二校，遷入上海租界或香港暫時續辦的有二十五校，停辦的有十七校，其餘十四校或是原設後方，或是原設上海租界，或是教會大學能在淪陷區勉強維持的，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淪陷區內的大學幾乎都停辦，只有少部分學校員生遷移至後方，繼續辦學。⁸⁴可見此時教育環境因戰事動盪不安，不論是因戰事淪陷遷徙至後方的學校，亦或是原在後方的學校，要在烽火連天的環境下持續辦學，實屬不易。有些學校無法繼續辦學，有些學校為了維持教育，展開教育與文化的遷移，為使「戰時教育平時化」的方針能真正落實，國民政府面臨教育經費短缺與大量學校被迫離散的問題，為安頓內遷學校及學生，聯合大學便因此出現。

聯合大學的組建，抒解中國高等教育缺乏師資與設備的問題，如：易社強在《西南聯大：戰爭與革命中的中國大學》一文提到「三校教員不僅相互補充，而且有重合之處。他們志同道合，彼此尊敬，使昆明時期的聯大自然而然成為三校歷史上互助協作的頂峰。」⁸⁵由此可見，西南聯大成功整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師資陣容完整，成功整合抗戰時期有限人力與物力資源。除此之外，聯合大學也舒緩了中國長期以來教育資源內陸分佈不均的問題，高校由沿海往內陸遷移，促進沿海與內陸的文化交流，透過文化碰撞，有助於中國內地產業的發展。

國民政府教育部除了要維持原有教育外，也評估當時的需要，對於高等教育加以擴充，增設許多大學院校。如：江西省內缺少大學，曾設立國立中正大學；浙江大學由浙江遷出，浙省缺少大學，曾設立國立英士大學。⁸⁶在師資的培育上，為了要落實戰時教育政策，培養中等學校教育師資，教育部在許多大學添設師範學院，如：貴陽師

⁸⁴ 吳俊升，〈戰時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13。

⁸⁵ 易社強，《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頁 138。

⁸⁶ 吳俊升，〈戰時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2。

範學院、南寧師範學院、湖北師範學院，並將國立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獨立設置，更名為西北師範學院。

為了提供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國民政府透過增設學校，提供許多技藝專科學校，如：西北農業專科學校、重慶商船專科學校、西康技藝專科學校、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國立社會學院、國立音樂學院…等校。秉持這理念，教育部針對大專院校「量、質」的教育問題進行改善，在學校數量上，不應因為戰事而縮減，並且依據需要，還需相當擴展；在教育品質上，正常教育仍應維持，為建國預備人才，為適應軍事需要，應加強特殊訓練，以備戰時徵召。由於戰時對於高等教育的維持與擴充，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受惠於高等教育者在數量上有很大的增加。

表 3-1：

抗戰前與戰爭結束時專科以上學校教育人數比較表

| 項目 | | 二十五學年度 | 三十三學年度 | 增減數 |
|------------|------|--------|--------|---------|
| 專科以上 學校 | 校數 | 108 | 145 | +37 |
| | 教員數 | 7,560 | 11,201 | +3,641 |
| | 學生數 | 41,922 | 78,909 | +36,987 |
| | 畢業生數 | 9,154 | 12,078 | +2,924 |
| 大學 研究所 | 所數 | 22 | 49 | +27 |
| | 學部數 | 35 | 87 | +52 |
| | 研究生數 | 75 | 422 | +347 |

資料來源：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擷取於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頁 17。

第三節 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任務

壹、穩定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培養國家建設、人才的搖籃，也是維繫社會文化的橋樑，高等教育本是以學術獨立與行政自主為最高原則，但因長期以來中國教育並無統一規準，導致各校校風自由，校自為政，人自為政，缺乏共同的規準。吳俊升認為抗戰處非常時期，國家與社會出錢辦高等教育，國民政府為了要達到國家與社會目標，不得不再相當範圍內施行管理之權。⁸⁷吳俊升對高等教育持論如此，故自其主持高等教育司後，積極落實其對高等教育改革之理念，政府力量亦一步步介入大學事務中。⁸⁸

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九年四月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國民政府以三民主義教育為宗旨，並以「穩定」與「建設」兩大核心理念下，規定大學教育目標如下：「大學及專門教育，必須注重實用科學，充實科學內容，養成專門知識技能，並切實陶融為國家社會服務之健全品格。」⁸⁹。教育宗旨的訂定，改善了在抗戰前教育政策不明、教育制度不健全，教育難以在穩定的情況下發展的弊病，讓教育能維持，並謀充實內容，提升教育品質，經過戰時，直到今日，猶為自由中國教育所奉守。

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通過由全國代表大會制定的抗戰建國綱領，統一全國高等教育須遵守一致的準則，這是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為了充實抗戰力量所做的一件大事。抗戰建國綱領的制定，讓漫無目標的大學必須依據政府所推動的各項教育方案內

⁸⁷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頁 28。

⁸⁸ 管美蓉，《從自主到統一——抗戰前鋒大學入學考試的發展(1938-1940)》，頁 114。

⁸⁹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取自：<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2562/?index=9>

容辦學，種種措施不僅能以改善過去教育缺失也能夠讓抗戰時期有了確切的發展目標，更能符合抗戰時期的需要而訂定。

由於戰時交通工具困難，費用浩大，各中學畢業學生以及從戰區流亡後方之中學畢業生分散各處，教育行政當局為了便利學生投考、整齊大學入學程度，以及促進中等教育之改進，乃於一九三八學年度開始舉辦大學入學統一考試，連續舉辦三年，辦法則逐年改進之。⁹⁰國民政府為了讓國人不會因為戰爭的緣故，無法持續就學，統一招生讓每個人都有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因此於一九三八年首次統一招生，設立公立各院校統一招生委員會，訂定統一考試的辦法，並於後方各考區設分區招生委員會主持報名、考試、閱卷及評定成績、向部設委員會彙報等事務。⁹¹大專院校透過統一招生，對學生而言可以就近考試，省去各地奔波與經濟損失，對學校而言，不僅省去自辦招生的麻煩，也能針對學生入學程度有所控管，讓大學維持相當的水平，各院系錄取學生人數也能依照國家需要而確定，統一考試的制度，不論對於校方或是學生，各方均蒙其惠。

除此之外，面臨內憂外患的中國，在七七事變後，許多知識份子都遭受摧殘，中國戰區青年不甘忍受奴化教育，與坐視國家之淪亡，紛紛轉入大後方，或是奔赴延安投靠共產黨。隨戰區擴大，廢學失業的青年日益增多，為穩定控制高等教育的發展，國民政府另一項措施則是重視青年救濟，在戰時中央經費緊縮的情勢下，教育部仍向行政院爭取經費救濟青年、爭取青年，為此陳立夫在《成敗之鑑》一書中提到：「大凡子女之能入中學或大學者，其家庭多半為中上之家，吾人若在後方照料其子之學業，其父兄絕不為日偽所利用，甘為漢奸；奔赴自由區之學生青年，深信政府必能為之設法，若來而無人照顧，勢必為共黨所設之抗日大學等勾引，欲求補救，將不及

⁹⁰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8。

⁹¹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8-29。

矣。」⁹²，吳俊升亦在《戰時中國教育》中提到，戰時對於青年的教育工作便是爭取青年：「因為青年如經招致、救濟與訓練，則其父兄陷在戰區者，必增內向之心，減少為敵偽利用的機會；又因為青年流離失所，趨向不定，容易受別有企圖的政治和軍事的集團藉抗日為名，大量招致，加以訓練，作為達到政治企圖的工具。」⁹³，由此可見，為了保護這些青年，國民政府非常重視來自戰區的學生，也積極推動青年訓練，對於在淪陷區無法就地接受教育的青年，則在各地設站招致運送後方安置，這項措施自一九三〇年起至一九四三年止，招致青年高達十五萬四千八百九十六人，此等青年離鄉背井生活無著，其衣食住所均由教育部籌款供給。⁹⁴教育部藉由貸金、公費的政策協助失學青年繼續求學，也提供經濟斷絕的學生資源。

不僅如此，為提供給原在大專學校肄業之學生，能夠不因此輟學，教育部擬定「借讀辦法」，這是戰時首創。凡是戰區甚至港澳大專學校學生一律分發學校，插入相銜接之科系班級，極大多數均在借讀學校完成學業，原在戰區大專院校學生聞有借讀辦法，雖不經招致，亦源源而來，戰時大學院校學生人數之增加，借讀生為其來源之一。⁹⁵

在全面抗戰時期，教育部根據戰時狀況，擬定各項建國與抗戰併重的教育政策，對於當時混亂崩潰的教育環境產生穩定的作用，也對當時教育出現的弊病提出改善方案，幸賴政府積極強化高等教育，才使高等教育未因戰時烽火停止，反而蓬勃發展。

⁹² 陳立夫，《成敗之鑑》，頁 286。

⁹³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44。

⁹⁴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45。

⁹⁵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45。

貳、培育抗戰建國併重之人才

人才是國力的根本，建國需要專門的人才，抗戰首要任務便是強化民族自信與道德精神教育，為此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全國教育會議決案中指出：「政治和教育，是互為因果的。從政治方面講，有怎樣的政治需要，才有怎樣教育設施；從教育方面講，有怎樣的教育培植，才有怎樣的政治收穫。所以教育必須適應教育政治方面的要求，而政治 必須仰仗教育方面的播種」⁹⁶由此可見，三民主義教育制度的制訂，要求教育體系必須依三民主義為本，學校在培育的學生的過程，除了傳授正常知識外，也需要注重道德的培育，培養民族的愛國心，齊力抗戰。因此在該會議中大力宣揚三民主義教育：「所謂三民主義教育，就是以實現三民主義為鵠地的教育；絕對不是單單在教科書中摻入一些三民主義的話，或在教育行政機關裡貼幾張三民主義的文告，就算完事的。我們全部的教育，應當發揚民族精神，提高國民道德，鍛鍊國民體格，以達到民族的自由平等；應該養成服從法律的習慣，訓練集體協作和使用政權的能力，以導入民權的正軌；應該提倡勞動，運用科學方法，增進生產的技能，採取藝術的陶鑄，豐富生活的意義，以企圖民生的實現。」⁹⁷由此可見，為建設強盛而富足的中國，國民政府將三民主義的教育三大理念轉化為民族精神、公民教育以及生產教育的三項教育政策。

因此除了培育國民愛國的民族精神外，為培育具專業性、能生產的大專院生，在《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強調研究和學術性；《專科學校法》則是強調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側重應用性⁹⁸。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制訂，乃是配合抗戰時期的需要，

⁹⁶ 擷取自汪伯軒〈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引自〈為什麼要實施三民主義的教育〉，《三民主義教育宗旨說明書》（三）。載於《教育雜誌》第20卷第六號，總頁31449。

⁹⁷ 擷取自汪伯軒〈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引自《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大會宣言》。載於《教育雜誌》第20卷第六號，總頁31448。

⁹⁸ 藍海正、劉彩梅，《中國教育史》，頁261。

計劃性地培育人才，提供抗戰建國所需，在戰時教育實施方案中，對於各級教育對象及教學目標有清楚的規定。專科學校教育應為培養各業專門技術人才之教育，應由省市視需要在企業之附近地區，設立各種專科學校，已造就個樣事業應用之專門人才；大學教育應為研究高深學術培養能治學治事治人創業之通才與專才之教育，其學院之設施，應以國家之需要為對象。⁹⁹為培育出抗戰建國人才，建設現代化的中國，高等教育對國家興亡當負起重大的責任。

整頓人才教育亦是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積極推動的政策之一。救國大業固然仰賴大多數有現代知識技能，富有愛國情緒，能犧牲一切為國家效忠的國民，可是在各方面領導國民做切實救國工作的，還是少數傑出人才。¹⁰⁰人才的盛衰與國力成正比，在國難期中更應注重培育任重而致遠的人才。



⁹⁹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2。

¹⁰⁰ 吳俊升，〈論國難期內的教育〉，《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頁 138。



第四章 吳俊升在抗戰時期所推動的高等教育政策

本章節將探討吳俊升所提出的「戰時教育平時化」之教育方針所衍伸的各項政策之規劃背景、過程與意義，並以戰時環境與國民政府對教育的期待為出發點，結合整體施政規劃與操作進行研究。

第一節 戰時教育平時化在國難時期的提出

壹、戰時教育平時化提出背景

二十世紀初日軍大舉入侵中國，教育界逐漸覺察到為求民族的自衛與生存，全國各界對於挽救國家的危亡。中國過去的教育制度，多是學習模仿外國，當國家面臨巨大災難的抗戰時期，有關戰時教育主張的論述甚多，紛紛提出不同的見解，挽救國家危亡似乎已成為每個人的責任，因此不論教育界專家或是當時在平津地區的學生，各個都希望能藉由擬定教育方案來拯救國家，教育救國儼然已成了全國人士所關切的問題，但因立場不同，論斷也大不相同，在議論紛紜的情況下，主政者若無法有效統整，並且確定政策，恐使教育陷於紛亂之中，影響全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更關係到抗戰建國的成敗。

在清末中國採行新教育，一方面希望利用新教育抵制帝國主義者，一方面則是希望施行新教育後能夠富國。自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成立京師同文館，制度的正式建立則是在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庚子八國聯軍後，但也因為當時科舉制度剛廢除，教育的精神與內容尚未能完全脫離過去，且當時中國正值軍閥割據、內戰頻仍，政治既無法上軌道，教育亦無從建樹。直到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成立，才開始積極建設，且至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的這十年間，更是中國實施新教育以來最有效的時期。

國民政府成立後，深信教育為建設國家之本，並經過多次討論後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其內容為：「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¹⁰¹自此宗旨公布後，全國教育設施，方有遵循，教育方針便是遵循三民主義之教育，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之生存，發展國民之生計，延續民族之生命，發展國民之生計，延續民族之生命為最大目標，並且要求各級學校的三民主義之教育應予全體課程及課外作業相貫連。

除此之外，蔣介石在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以「抗戰建國時期教育實施方案」¹⁰²為主題，提出「戰時教育須作平時看」的觀點，一面改造過去的缺失，一面爭取民族生存，為了抗戰與建國，教育上的著眼點不應只在戰時，還應該看到戰後。因此，確定統一的教育政策以穩定抗戰時期的教育環境，儼然已成為抗戰勝利的首要步驟。

「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於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四大教育綱領，以及「各級教育實施方案綱要」，為中國抗戰建國的教育政策。為配合抗戰建國並進的需要，針對高等教育規定必須注重實用科學，充實學科內容，養成專門知識技能，並切實陶融為國家社會服務之健全品格，這亦成為全面抗戰時期改善高等教育的重要項目。

貳、吳俊升出任戰時高等教育司長的背景及作用

吳俊升本為北京大學教育系主任，在休假期間赴美考察，返國時因國內正面臨全面抗日戰爭，忽於一九三七年底接到來自漢口的電報，隨即晤見當時教育部陳立夫部長，並任高等教育司司長一職。吳俊升是全面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司司長，自一九三八年就職起至一九四四年終行政院改組，隨陳立夫部長離職為止，共計七年。¹⁰³

¹⁰¹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3。

¹⁰² 全國教育會議，取自：<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4413/?index=4>

¹⁰³ 吳俊升，《教育生涯一周甲》，頁78。

吳俊升尚未進入教育部前就曾指出中國在清末時採取的學校制度就是國難教育，但施行六七十年後，國難卻仍然無法解除，反而格外加重。探究主要原因則是因為全國未能有統一的教育目標，一切教育的理論和實施，紛紜變化，失去重心，即便有各派的教育思潮先後相繼而起，但是旋起旋滅，沒有一派思潮能支配中國教育的全體並維持相當時期，成為一個主要的教育哲學。對此吳俊升中國播切需要一種哲學，帶領中國教育正確的方向。

在一九三六年於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欄發表「論國難期內的教育」一文，文中吳俊升指出國難期內的教育不論在計畫上或是實施上，首要任務都是必須先認清教育的效能以及限度，教育若要到達解救國難的目標，勢必應與全國的其他計畫通力合作，若欲單靠教育完成救國，是難以達成效果的。因此他提出「教育其能表現救國的實效，還得另有一個比較久遠的方案，應該根據挽救國難的大目標，把整個教育的精神，重加刷新，把整個的教育組織，重加調整。」¹⁰⁴ 吳俊升指出，在國家面臨重大災難時，教育無法發展，主要原因莫過於教育方針朝夕令改，教育政策不完善，沒有一貫的教育目標，教育便難以負起救國的重任。所以在國難期內所需要的教育，不應該只是在原有教育之外另加一部分特殊教育，也不是應付一時非常局面的教育，而是應該全部貫徹救國為目的，施行應付來日大難的教育，他認為抗戰是長期，戰時教育需延續到戰後的建國事業，兩者皆需大批人才，教育不能驀然停止，原有教育必得維持，這亦是當時中央的決策。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秉承中央決策，認為高等教育在「質」與「量」兩者都應需提升¹⁰⁵，施行了內遷與緊急救濟的方案，認為學校在數量上，不僅不應縮減，而且還得依據需要，進行相當的擴展；在學校的品質上，正常的教育仍需維

¹⁰⁴ 吳俊升，〈論國難期內的教育〉，《教育論叢》，頁 130。

¹⁰⁵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頁 243。

持，也必須為了建國儲備人才，為了軍事需要，應在正常教育裡加上特殊教育，以備戰事隨時徵召。

對於教育平時化的思想，吳俊升本身並非國民黨員，卻能在國民黨「以黨治國」的時期，擔任影響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角色與其教育背景及教育理念，主因為他所並持的教育理念與當時中央的決策相同，教育是百年大計，只可因戰爭做若干臨時調整，而不能全盤改弦更張，主張保持現行學制、教學內容與形式，而非將學校視成僅為短期戰時而辦的訓練班，實行「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教育方針，對於中國教育現代化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尤其在教育體系的維持，讓中國教育並沒有受歷時八年的抗戰而出現人才斷層，在高等教育上，提供戰區學生教與養，保障大學師生有相對穩定的環境從事科學研究與學習，種種教育政策的推動，反而為抗戰時期的教育寫下璀璨的一頁。



第二節 高等教育課程的改進與調整

民初新文化運動受到西方民主、科學的影響，強調思想自由、個性解放，雖然激起民眾的愛國心，卻也因為崇尚西方文化，課程多半直接承襲西方，屏棄中國的傳統，或是與中國文化脫節，崇西輕中，以致許多課程的實施並不符中國需要。直自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成立後，全部教育始加速進展。¹⁰⁶

當時教育部長陳立夫就曾針對中國教育「外國化」的狀況有許多批評，他發現當時的大學都像外國租借：「這個完全採德國學制，那個完全採法國學制，其他不是採美國制，即是英國制。」¹⁰⁷陳立夫認為將外國學制盲目照抄，不依中國國情與文化調整，最終將導致國力與文化衰退。除此之外，朱家驊曾在一九三一年，擔任教育部長的期間，於中央黨部總理紀念周發表演講《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及應注意各點》¹⁰⁸，內容指出大學沒有辦法適時的造就社會所需要的專門人才，這是全面抗戰前的中國教育概況及問題，主要因為高等教育缺乏發展性計畫，例如：大學經費未做妥善運用，不重圖書、儀器，忽視基礎課程，反而將大筆經費用在增設不必要的科系、課程，導致人事成本增加，課程設置不合理，也造成經濟資源的浪費。

教育部於一九三三年通令各大學整理院系，對各校視察並提出報告，針對師資設備缺乏，導致無法發展的院系都必須進行裁併計畫，並承給教育部執行，教育部根據報告裁撤或合併大學院系，以減少大學院系的重複設置，應實際的需要集中財力與師資，充實其發展。一九三八年，教育部公佈《文理法三學院各學系課程整理辦法草案》後，首先從整理文、理、法三學院的課程開始，並針對全國大學各院系的必修與選修課程，一律由教育部規定範圍，各大學院系在此範圍內可酌量增減¹⁰⁹。

¹⁰⁶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7。

¹⁰⁷ 陳立夫，《從根救起》，頁65。

¹⁰⁸ 中華民國使檔案資料彙編，《朱家驊在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上演講「中國大學教育的現狀及應注意各點」》第五輯第一編：教育（一），頁281。

¹⁰⁹ 藍海正、劉彩梅，《中國教育史》，頁262。

由此可見，無論是在抗戰前或是抗戰時，時任的教育部長都主張對大專院校的課程進行調整，全面抗戰前，高教課程設置較為自由，各校在課程設置上能自行擬定，但也存在許多弊端。如：吳俊升在《教育生涯一週甲》一書指出國聯調查團對於我國大學的教育現況有所批評課程方面不切中國需要、教學內容支離分裂、教學方法偏於注入。為改善這狀況並培養全面抗戰時期抗戰建國的人才，吳俊升於一九三八年上任後便著手整理課程，針對高等教育全面管理，提出〈大學組織規程〉與〈課程整理辦法〉，規定統一標準、注重基本訓練、注重精要科目三項課程發展原則¹¹⁰。

在課程改進的原則有三點：首先，透過規定統一課程的標準，首先在必修學分上實施，不許各校自行規定，但選修科目仍保有彈性，暫依各校規定辦理；接著，注重基本訓練，要求學生對於一般學術的基本訓練必需足夠，才能進一步深造，因此將國語、外語、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列為共同必修；最後，注重精要科目，學生能學得一技之長，在畢業後能夠有所發揮。本節將針對此三項課程發展原則進一步說明。

一、重新整頓課程，規定統一標準¹¹¹

中國採取新式教育制度後，教育不斷的進步，教育宗旨與方針趨向促進國家的現代化。一九〇四年清末公佈《奏定學堂章程》，這是中國第一個正式實施的近代學制，內容針對對各級學堂的目標、課程、年限、入學條件、組織、校舍、圖書、儀器設備、學規以及各學堂間的相互銜接關係等方面，都有了明確的規定；一九一三年，《大學規程》比《奏定學堂章程》更為詳細地列出了各系科目名稱；一九二二年，教育部為適應社會進化的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適性發展，大學採用選科制；一九二四年，教育部在頒布《國立大學條例》中明確規定，國立大學其課程得用選科制，國立大學各科、各學系及大學學院、各設教授會、規劃課程及其進行事宜。當時由於

¹¹⁰ 藍海正、劉彩梅，《中國教育史》，頁 262。

¹¹¹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5。

新學制的規定，單設一科的學校也可稱為大學，中國大學及專科學校隨之紛紛建立，但在抗戰前大學院系的設置及課程安排多為直接承襲西方的教育思想，缺乏正式規定。因此一九二九年四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大學教育的宗旨為注重實用科學，充實科學內容，養成專門知識技能，並於同年七月公佈《大學組織法》，並規定大學應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之宗旨，大學是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內容針對國立大學、省立大學、私立大學的設立、變更、停辦，都需經過教育部核准，為大學院系進行調整。

抗戰前期，大學各科課程都是各校自行規定標準，學風雖然自由，各校能因人才規劃課程自由發展，卻也導致學生程度良莠不齊，失去大學教育的一貫精神，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國內的大學最為發達，受人詬病之處也是最多的。如：課程設置混亂，在同一間學校中，科目類似的課程，常常僅有名稱差異，卻重複設置；以及科目名稱分歧，科目性質相似的科系，在此校為一名稱，另一校又為另一名稱。

因此教育部針對大學科系繁複、課程凌亂缺乏體系的問題於一九三七年提出「全國大學分系課程比較表」，比較分析，指出大學課程的種種缺陷，如下：（一）各校設課分歧繁複；（二）各校共同必修科目不一致；（三）各校必修選修科目不一致；（四）課程之份量各校不同；（五）課目設置之年級各有先後；（六）課目名稱分歧；（七）同一學校的課目重複；（八）偏重專門科目而忽視基本課程。¹¹²

針對上述設課與學分相關問題，教育部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召開第一次課程會議，頒布各學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規定各科最低標準，並允許各校因特殊情形增加其內容。關於共同必修科目之名稱、學分數目、修習年次等項目，教育部根據會議結果

¹¹² 教育部，《全國高等教育概況》，頁 57-62。

做最後決定，並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將文、理、法三學院共同科目表正式公佈，並自二十七學年度就讀一年級新生開始施行。¹¹³

除了大學開設課程缺乏完善的規劃外，在教材內容的選用上，國聯教育考察團亦曾指出當時課程不合中國需要，指出「在華參觀之人，考察中國若干大學之歷史、政治、科學或經濟之課程，若不能斷定此種計畫，究為研究中國之西洋學生而設，抑為研究西洋之中國學生而設，此等人實大有可原諒之處；而在自然科學方面教學偏重外國情形，尤為顯著。」¹¹⁴國聯教育考察團指出中國當時的教育過分模仿西方教育制度，導致教育明顯缺乏中國文化精神，與實際生活隔離，不切實際，教育重洋輕中，反而忽略中國在地的優良文化教材給予批評，認為「中國必須振作其本身之力量，並從自有之歷史、文獻，即一切真屬固有之國粹中抽取材料，以建造一種新文明，此種文明，非歐非美，而為中國之特產也。」¹¹⁵ 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指出高等教育在課程上也缺少有關中國的歷史與社會教學內容，他將這種現象以「文化租界」¹¹⁶來形容，認為這種現象與中國教育界淪為西方「文化殖民地」最有關聯。¹¹⁷全面抗戰前中國大學的課程不合中國需要，課程教材多採自外國，為時人所指責。

因此在大學教材內容缺乏統一標準與教材內容不符中國民情的缺失之問題，教育部為此於一九三九年成立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¹¹⁸，透由會議決定各學院、系共同必修科目級選修科目用書。大學用書的編輯方法有二：一為就坊間已印行之大學用書加以徵選，凡審查合格並徵得原著譯人同意後，酌加修訂，及作為部訂大學生書採選成書；二為公開徵稿；三為特約編著。¹¹⁹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根據整理好的科目，編輯大學教

¹¹³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499。

¹¹⁴ 國立編譯館，《中國教育之改進》，頁 182。

¹¹⁵ 國立編譯館，《中國教育之改進》，頁 32。

¹¹⁶ 陳立夫，《戰時教育行政回憶》，頁 20。

¹¹⁷ 陳立夫，《撥雲霧而見青天》，頁 294。

¹¹⁸ 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三九年，附設於教育部，並於一九四二年改隸國立編譯館。

¹¹⁹ 教育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05。

材，分析自然、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環境。這項政策規定各學系的必修科目，建立統一的課程標準，不僅提高一般大學課程的水準，也刪除不符中國國情與時代背景的缺失，不僅能讓國家文化與建設的政策相互吻合，也能以解決生活問題為依據，有益於培植抗戰建國的領導人才，實際參與國家建設的行列，將所學貢獻於社會。

綜上所述，課程問題乃是學校教育的實質問題，課程的改造，乃是抗戰時期高等教育急需解決的教育問題，欲要收回文化租借的問題，吳俊升在整頓大學課程上，分為四步驟如下：一為規定整理原則，二為規定各院系必修科目表，三為試編個必修科目之教材大綱，四為編輯大學用書。¹²⁰雖然吳俊升在推動課程整頓措施的過程中，有人認為注重中國文化，重視中國教材，未免是復古守舊，安於固陋，有妨中國的現代化。¹²¹因此為了克服這些阻力，國民政府憑藉相關法令，特別設立學術審議委員會¹²²，將有關大學教育審定、課程整理、學術獎勵，以及與高等教育有關的重要興革事項須經此會議決施行，並且採取民主的程序，不由行政人員專斷，而是由大學代表共同參與決議，因此在推動的過程中較能獲得認同與成效。

二、注重基本訓練¹²³，開展戰時服務

大學課程的設置應先注意學術廣博基礎的培養，訂定文理法各科的基本學科為共同必修，然後才專精一科，以求合於由博及約之道，使學生不因專門的研究，而有偏固的弊端。但當時中國各大學課程的分系與設置都相對較早，在大學課程設置中，各校輕視基本課程，只專注於高深專門的課程，是普遍現象，這樣的結果導致一般學術的基本訓練不能養成深厚的基礎，因為各科學術是相輔相成的，學生分科過早，不利

¹²⁰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5。

¹²¹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4。

¹²² 學術審議委員會成員一半委員由各大學校長選擇，一半委員由教育部選聘。

¹²³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5。

於深造。朱家驊部長曾批評這種現象：「經濟學系，經濟概論可以不有，馬克思的資本論非有不可；文學方面，學史之類的功課不關重要，各個名家的作品，非特設課程不可；地質系中非有一專門古生物的講座不可，至於普通地質學，隨便叫什麼學探礦的或學土木工程的人來教教，都不要緊。物理方面，普通物理可不注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管教者學者如何，都非有不可。甚至於數學的微積分，都可馬馬虎虎找一個人來擔任的。」¹²⁴由此可見，大學課程容易輕忽基本的知識，只注重某些專門科目，不利於學生的學習。

除此之外，中國長期以來學校教育與社會實踐嚴重脫節，教死書、讀死書，引發許多憂國憂民的學生不滿，如：武漢大學的學生申訴：「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民族生死存亡大決戰的非常時期，然而我們所受的教育，卻與戰爭毫不相關。」、「抗戰已經開始了三個多月，然而我們的精力還花之背公式，讀古典，應考試。」¹²⁵從中可以發現，當時中國大學雖面臨戰爭動亂，但學校教育方向似乎沒有因此而有改變，導致許多學生為此感到氣憤與無奈。

因此國民政府教育部針對以上的問題，提出許多具體改善的方法，並根據抗戰與建國的需要，培養多方面的戰時人才，在大專院校增設了許多相關的科系，以及有關的技術學程，做了基礎性的工作。如：一九二九年教育部公佈《大學規程》，除了規定大學辦學需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實施方針外，並規定大學課程的共同必修科目為黨議¹²⁶、國文、體育、軍事訓練及第一、二外國文，對於沒有分系的一年級生設置基本科目，並規定大學採用學分制。一九三〇年，教育部即著手組織大學課程及設備標準起草委員會。直至抗戰爆發前，教育部除了頒佈醫學院暫行科目表外，其他各院系

¹²⁴ 王聿均、孫斌，《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 127-128。

¹²⁵ 梁甌地，《戰時的大學》，頁 69

¹²⁶ 開設黨議課程目的為透過意識形態的教育進行行為控制與管理。

科目表還未頒行，但課程調整已初見成效。除了注重學術廣博的培養，並將文、理、法各科的基本學科訂為共同必修。強調由廣博出發，繼而精深，最終達到簡約。

抗戰建國需要人才，為因應戰時特殊需要，國民政府教育部除了維持原有的課程外，亦在不同校系增設了一些特種教育科目，特種教育在抗戰時的目標有二，如下：

一、依據抗戰建國綱領，加緊實施抗戰建國之教育，務使一般民眾富於民族知識，國家觀念，確立民族國家高於一切之信心，以激發其犧牲赴難之精神；二、組訓一般民眾，使具有公民的資格，普通的常識，自衛的力量與生產的技能，其可增進國民道德，提高文化水準，嚴密社會組織，發展農村生計，以增強抗戰力量，奠定建國始基。¹²⁷如：理科增設國防化學、火藥學；工科增設兵器學、防空學；文科增設歷史戰爭史料的課程；教育增設戰時教育、軍事心理學的課程。在抗戰時期的清華大學特種研究所，不僅在推進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還以科研成果積極支援抗戰事業。¹²⁸由於國民政府在課程上做了些許調整，促進了許多與戰時環境相關的科技成果出現，特種教育不僅提供抗戰人才的需求，更是激發了民眾抗日救國的熱情，這種以民族動員為中心為戰時服務的特種教育，在中國教育史與科技史上都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注重精要科目¹²⁹，加強實科教育

在國民政府尚未對大學課程加以整理前，許多大學在科目設置上繁瑣混亂，內容支離繁雜，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難以掌握，知識難以連貫，因此教育部對於一般大學科目之設置，力求統整與集中，使學生對於一種學科之精要科目，能充分修習，融會貫通，瑣細科目一律刪除。¹³⁰教師在各科教學時，除了上課講習外，對於學生自習討論

¹²⁷ 江西省教育廳編，《江西省特種教育二十七年度實施方案》，截取自周曉東、韋福安，〈抗戰時期江西特種教育述論〉，《重慶師範大學學報》2006 第六期，頁 34。

¹²⁸ 陶莎，〈抗戰時期大學課程調整〉，頁 28。

¹²⁹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6。

¹³⁰ 教育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495。

與習作或實驗上，也應同時並重，由教師詳細規定自習書目與其他參考資料，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精神。

在加強實用科學教育方面，中國長期為自給自足農業經濟為主的封建社會，實科教育相對落後，培養各類人才是教育目的之一，但在戰前中國大學課程，常常偏重文法科，而忽視農工醫各科，中國的大學教育從重人格修養的人文主義教育，轉而注重自然科學為主的實用科學，則與戰爭以及國家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一九二〇年代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在中國學術界出現，「科學派」與「玄學派」的學者展開科學與人生觀的學術爭論，除了因為當時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方面所需要的實用人才嚴重短缺，另一原因則是高校生畢業後就業困難，這讓中國學術界開始探討西方科學技術是否有拯救國家，中國應拋棄傳統的人生觀、認識論，被視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篇章，讓許多遊歷西方的學者，開始思考中國引進西方文明所帶來的價值，這是大學教育重人文輕實科轉變的契機。

注重實科教育原為戰前的政策，為了適應戰時專技人才的需求，對於醫工學院與技藝專科學校也有所增設，據統計，在抗戰前五十八所公私設立大學中，約 70% 設有文科，49% 設有法科，22% 設有農科，27% 設有工科，12% 設有醫科。而在二十六所專科學院中，有六所專修法科，四所專修文學藝術類，農工醫專科學校合計僅十五所。根據教育部一九三〇年統計，修習文法科的學生人數高達一萬七千人，而農工醫等科學生合併計算，僅為八千多人，不及文法科學生的二分之一。¹³¹ 不僅如此，國聯教育考察團在《中國教育之改造》報告書中指出，中國教育的缺點為各大學的自然科學與工科萎縮過度，法科、文科和政治學科發展過甚，這是對學生個人或國家大局和社會發展極為有害的弊端。中國大學對於國家的貢獻雖屬可嘉，但其所造就的不過大批具

¹³¹ 王聿均、孫斌，《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 138。

有新聞學家或演說家的知識與志願的人才。此份報告還進一步指出，若繼續照這的情況發展，結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過剩，而農工醫等實業人才之缺乏。

教育部針對上述問題，明令提倡農工醫等實科教育，使現有文法諸科教育不事擴學，而於現有農工醫諸實科與理科則力求充實。¹³²因此教育部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頒布的《改進大學文法等科設置辦法》，內容提到「全國各大學及專門學院之文法等科，可由教育部派員視察，如有辦理不善者，限令停止招生或取消立案分年結束。嗣後遇有請設文法等科者，除邊遠省分為養成法官及教師，准設文法等科外，一律飭令暫不設置。又在大學中，有停止文法等科學生者，其節餘之費，應移作擴充或改設理、農、工、醫藥等科之用」。《改進大學文法等科設置辦法》的頒布，更加嚴格規定全國各大學及專門學院的文科設置與限制，改革效果顯著，不僅改變中國高等教育不且實用的風氣，為高等教育的發展確定了方向，也為國家經濟發展與國防建設累積了人才，為全面抗戰做了教育準備。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發生後，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的階段，教育部長由有工程背景的陳立夫出任，認為教育沒有戰時與平時之分，無所謂戰時教育，因為平時教育實質上包含著戰時準備。今後之根本教育方針，須德智兼顧，文武合一，工農並重，教育與政治設施、經濟計劃及社會生活尤須貫通，並與其他機關密切聯繫。¹³³實科教育的擴充，不僅解決了當時所面臨的物質困難，也讓中國逐漸形成重視科學的社會風氣，平衡了抗戰前期中國文科與實科發展不均的問題。

¹³² 王聿均、孫斌，《朱家驊先生言論集》，頁 139。

¹³³ 王炳照、閔國華，《中國教育思想通史》，第七卷，頁 363。

第三節 貸金制度的推展

在抗日戰爭的重壓下，中國高等教育受到嚴重且難以彌補的破壞，戰爭迫使在戰區的校舍要長途搬遷，或是有些校舍被侵佔、設備慘遭破壞，導致許多離鄉背井的學生頓時流離失所，失去經濟支援，生活極不穩定。因此國民政府不得不制訂相關政策、法令，並以金援方式，直接拯救戰區學生，給予經濟及其他方面的救濟，協助學生完成學業，貸金制度是重要措施之一，本節將說明貸金制度的推行背景及政策實施的狀況。

一、貸金政策的實施背景

一九七七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攻佔中國華北地區，除對國民政府設在南京的軍事目標進行空中打擊外，甚至對居民區、文化、教育、醫療組織機構等非軍事區域濫施轟炸。日本違反簽屬的《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¹³⁴第五十六條「市政當局的財產，包括宗教、慈善和教育、藝術和科學機構的財產，即使是國家所有，也應作為私有財產對待。對這些機構、歷史性建築物、藝術和科學作品的任何沒收、毀滅和有意的損害均應予以禁止並受法律追究」的條約。主因為日本認為中國的大學是反日運動的主要據點，為達到長期統治中國，日本極力奴化中國青年的思想，對各高校進行轟炸，摧殘中國教育文化機關，企圖消滅中國固有文化，導致校園設備、物資、學生宿舍…等無一不受侵占。根據統計，從抗戰爆發到一九三八年底，有九十四所高校被破壞，其中十四所全毀，二十五所被迫停頓。¹³⁵ 大量的教學設備、實驗儀器、圖書資料

¹³⁴ 《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指軍隊執行作戰任務，必須遵守武裝衝突法及國際法的相關規範，確保作戰行動的合法性及正當性，除規範作戰使用武器的規則之外，還有關交戰者、敵對行為、軍事佔領…等，相關規則。

¹³⁵ 杜元載主編，《革命文獻》，第60輯，頁3。

毀於一旦，損失高達三千三百六十餘萬元¹³⁶，對中國高等教育而言，著實是非常嚴重的損失。

戰爭迫使許多在戰區第一線的學生流離失所，衣食無著被迫搬遷，有許多學生因此失去經濟來源，生活陷入困境的學生，變因難以維持生計，無法繼續求學，逃亡到西部地區，或是逃至由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培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的「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¹³⁷繼續學習。由於戰爭的緣故，日軍佔領東南沿海地區，而東南沿海又是中國重要的財富來源，中國因此失去財富收入一半以上的關稅，又加上軍費開銷增加，財政狀況窘困，教育經費嚴重缺乏。

全面抗戰爆發後，教育部強調「戰時須作平時看」的方針，為明確指示各教育機關師生接濟工作的緊急應變措施，頒布「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之綱要」¹³⁸，在第五條以及第六條中，其內容強調戰時教育經費的運用，包含「為安定救國教育工作起見，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經費，在戰時仍應照常發給，倘至極萬不得已有酌量予緊縮之必要時，在中央應由財政部協商呈准行政院核定後辦理，在地方應由主管財政廳局會商呈准省市政府核定後辦理」，以及「中央及各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於戰區內學校之經費，得為財政緊急處分，酌量變更其用途，必要時並得對於其全部主管教育經費，為權宜之處置，以適應實際需要」。由此可見，國民政府認清抗戰是長期的，戰後的建國事業需要大量各種人才，教育是讓中國能薪火相傳的根本，教育決不能因而中斷，且因流亡的學生人數持續在增加，國民政府為解決這迫切問題，切實考慮加大教育投入，挽救教育危機，便開始著手研擬救濟學生的方案。

¹³⁶ 金以琳，《近代中國大學研究》，頁 229。

¹³⁷ 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位於陝西省北部的延安市，辦學時間為 1933-1945 年，是由中國抗日時期中國共產黨創辦，目的為培養軍事和政治幹部的學校，學生來源為駐校輪訓中國工農紅軍的各級部隊幹部，後期大量培訓從陝西、甘肅、寧夏外奔向延安的抗日知識青年。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5%86%9B%E6%94%BF%E5%A4%A7%E5%AD%A6>

¹³⁸ 《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綱領》是指對日戰爭爆發後，1937 年 8 月 27 日，國民政府為適應戰時需要頒發，指示戰事迫近時各級教育處理辦法。

陳立夫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上任後，秉持正常教育應維持，對教育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國民政府為了讓學生有繼續學習與安定戰時環境，教育部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五日頒布《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協助戰區學生復學，是貸金制度之始。政府為使戰區青年安心求學，於一九三八年起設置貸金，規定公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之籍隸戰區經濟斷絕者均可申請，畢業後再將服務所得繳還學校。¹³⁹陳立夫認為發放貸金背後有兩個重要的意義：一是救濟家在淪陷區學生，以收纜淪陷區學生家長之心，免其充當漢奸；二是同共產黨爭取青年。¹⁴⁰因為在當時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參加教育工作，是國民政府與共產黨共同的目標。

二、貸金政策施行過程

由於戰區青年學生大多經濟來源匱乏，國民政府為使他們安心學業於一九三八年起設置了貸金制度，公布《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規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家在戰區，費用來源斷絕者，經證明為必需救濟者，得向所在學校申請貸金。¹⁴¹直接向學校貸款，包含膳食、服裝，及免費住宿…等各項費用，以維持生活，不因經濟困難輟學。

貸金亦稱貸學金，是抗戰時期國民政府貸款給戰區學生以維持生活的一種經濟救濟措施，包括膳食及衣服等各項費用。¹⁴²貸金分為全額與半額兩種，按當時膳食價格規定，全額每月八元或十元；半額每月四元或五元，以所在地生活費用及學生之實際需要決定之。¹⁴³貸金制度的施行，減輕學生經濟壓力，使其能安心生活，專心求學。

¹³⁹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3。

¹⁴⁰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頁 286。

¹⁴¹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3。

¹⁴² 王朝輝，〈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高校學生的經濟救濟〉，《東山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4)，頁 97。

¹⁴³ 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頁 2。

一九四〇年，各地物價飆漲，貸金需求增加，因此在膳食貸金辦法需進一步重新修正，將原本的全額貸金與半額貸金細分為三類，如下：

一、膳食貸金：全膳與半膳兩種，數額視各地生活費之高低，由教育部分別規定。

二、零用貸金：規定每名三元，經濟較困難的學生可以申請，惟此項貸金名額不得超過戰區貸金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六十。

三、特別貸金：分服裝與書籍兩項，每名每學期金額共二十元，半額十元，經濟特別困難的學生於膳食貸金以外，還可以申請此項貸金，惟此項貸金名額，不得超過戰區貸金學生總人數百分之十。¹⁴⁴ 除了膳食貸金依照原有辦法辦理外，特別增加零用貸金與特別貸金，維持學生生活。

物價隨著戰事日益飆漲，後方形勢惡化，貸金需求增高，自三十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教育部本令各校在經常費項下撙節撥付，但需求量已遠超出各校經常費所能負擔，國民政府教育部在一九四一年便針對貸金辦法加以補充《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貸金暫行規則》¹⁴⁵，主要增加膳食貸金額，如下：

一、戰區生膳食分為甲乙兩種，以每人每月食米二市斗一升，依照學校所在地中等熟米市價，另加副食費為計算標準，凡屬戰區生經濟來源斷絕者視其私生活情形，分為甲種或乙種貸金¹⁴⁶：

甲種：每月總額以十八元為膳食補助金，此外為貸金；

乙種：每月總額由學生自繳十八元，其超出之數，除以十八元為膳食補助金物，餘為貸金。

¹⁴⁴ 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頁 2。

¹⁴⁵ 教育部於一九七一年七月發佈《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貸金暫行規則》

¹⁴⁶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3。

二、自費生補助膳食貸金，亦分加以兩種，如下：

甲種：每月應需總額，除學生繳納十八元外，貸給其超出數的全額；乙種：每月應需總額，除學生繳納十八元外，貸給其超出數的半額。¹⁴⁷ 此項修正不僅扶持戰區學生，亦補助自費生，視其需求及家庭經濟情況補助。

貸金制度的施行，再請領與償還均訂有辦法，除此之外申請貸金的學生，平時每週需為學校服務三小時。然而貸金設置的目的是讓在學學生能夠減少因戰爭所受的影響，但因戰事受影響而申請貸金的學生越來越多，國民政府教育部見此狀況，逐步修正貸金制度，逐漸擴大發放的範圍，從原本規定僅在戰區的學生、公立專科以上學校的在學生，放寬條件至公立或已立案的私立學校學生，最終鑑於大部分學生都面臨經濟困難，再次擴大條件，只要是家境清寒者就可以申請貸金，政府不斷的修正貸金制度，愛護學生，就是希望能訂定出妥善的方案，讓學生能不必因為經濟問題，全神貫注於學業。

貸金制度從一九三八年起開始實行，直到一九四三年止，雖然施行的時間不長，但貸金制度卻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保障了許多戰區清寒學生的利益，讓流亡的學生能夠繼續求學，但也因為在實行的過程中，有些學校在貸金審查的過程過於寬泛，各校核給不免寬濫，致使貸金制度無法真正救濟戰區貧寒的學生，使得貸金制度的美意遭受破壞。

根據統計，一九四二年國家教育文化費四億六千萬餘元，貸金膳費所需數目即達九千六百餘萬元，佔教育經費總數五分之一以上。¹⁴⁸ 戰時國家財政困難，在國家財政支出上，教育文化費僅次於軍費，貸金制度確實增加政府財政的負擔，針對貸金濫用以

¹⁴⁷ 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頁3。

¹⁴⁸ 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頁9。

及償還不易的問題，教育部於是另訂《非常時期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規定公費生辦法》，規定三十二學年度所招新生，一律不適用貸金制度，另訂公費生辦法¹⁴⁹，貸金制度正式廢止，並由公費制度取而代之。



¹⁴⁹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3。

第四節 公費制度的推展

抗戰時期公費制度的產生必須從貸金制度談起，因貸金制度在抗戰後期逐漸無法達到實際救濟學生的效果，因此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決定將貸金制度做根本改變，重新將有限的經費依國家培育高等人才得需要重新分配，改行公費制度，在一九四三年擬定「非常時期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私立專科學以上學校公費生辦法」，這項新的制度起先主要針對師範、醫療、工學院等科，誘使青少年投考，直到同年底，西南聯大教師聯名遞交成情函才開放其他科別，但不同學院有不同的限制，本節將針對全面抗戰時期公費制度的內容進行探討。

一、全面抗戰時期公費教育制度的施行過程

戰時採行的貸金制度，雖然保有救濟學生的功能，但也因為抗戰後期戰事擴大，無價上漲，貸金制度的施行也出現許多弊病…等，教育部於一九四三年鑑於貸金制在學生畢業後，償還不易，且物價上漲，法幣貶值，即償還亦幾等不償，¹⁵⁰乃將貸金制度改為公費。

表 4-1：

抗戰期間國統區法幣發行與物價變動率（1937 年—1945 年）

| 年份 | 零售物價指數 | | 鈔票發行 | |
|------|------------------|-----------|---------------------|-----------|
| | 1937 年 1-6 月 = 1 | | 年底發行額 (法幣 10 億元) | 每年增加率 (%) |
| | 指數 (12 月) | 每年上漲率 (%) | | |
| 1937 | 1.18 | | 2.1 | |
| 1938 | 1.76 | 49.2 | 2.7 | 32.7 |
| 1939 | 3.23 | 83.5 | 4.8 | 75.2 |
| 1940 | 7.24 | 124.1 | 6.4 | 75.8 |
| 1941 | 15.95 | 120.3 | 15.8 | 87.5 |

(續下頁)

¹⁵⁰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頁 289。

| 年份 | 零售物價指數 | | 鈔票發行 | |
|------|-------------|----------|-------------------|----------|
| | 1937年1-6月=1 | | 年底發行額 (法朗10億元) | 每年增加率(%) |
| | 指數(12月) | 每年上漲率(%) | | |
| 1942 | 66.20 | 315.0 | 35.3 | 123.4 |
| 1943 | 22.80 | 244.4 | 75.4 | 113.4 |
| 1944 | 755.00 | 231.1 | 189.5 | 151.3 |
| 1945 | 1167.00 | 187.0 | 556.9 | 193.9 |

資料來源：許倬雲、丘宏達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

有鑑於此，國民政府於依據原先僅有少數學生因家境清寒，但成績優良享有的公費制度，進行修正推廣，並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式公佈「非常時期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規定公費生辦法」¹⁵¹。此法針對一九四三學年度所招收的新生適用，將公費生分甲、乙兩種：

- 一、甲種公費生，免膳食費，並得分別補助其他費用；
- 二、乙種公費生，僅免膳食費。¹⁵²

不僅如此，國民政府並根據抗戰建國時，對各項建設所需的人才規定各科公費生的名額，依據公私立學校、不同院科、不同需求，公費名額比例略有高低，享有的優待也大不相同，凡國立、省立專科以上學校新生，依據其資格分為甲種及乙種公費生，如下：

- 一、師範、醫、藥、工各院科系學生，全為甲種公費生；
- 二、理學院科系學生，以百分之八十為乙種公費生；
- 三、農學院學生，以百分之六十為乙種公費生；
- 四、文、法、商及其他各院科系學生，以百分之四十為乙種公費生。¹⁵³

在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新生，則依：

¹⁵¹ 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頁4。

¹⁵² 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頁4。

¹⁵³ 教育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一冊第二編，頁53。

一、醫、藥、工各院系學生，以百分之七十為乙種公費生；

二、理、農各院系學生，以百分之五十為乙種公費生。大學先修班學生則是以百分之九十為以種公費生。

國民政府教育部除了依據抗戰建國的人才需求，落實分配公費生名額，讓有限的資源重新分配，真正救濟到需要救濟的學生，對於實科學生和師範教育的人材，核給相較其他學科更優待的公費規定，促使醫、工、農、法、師範學院的人數在抗戰時期大幅增加，如下表：

表 4-2：

全面抗戰前（1936 年）到全面抗戰結束各科院學生人數統計表¹⁵⁴

| | 文 | 理 | 法 | 商 | 工 | 農 | 醫 | 教育 | 師範 |
|------|-------|-------|--------|-------|--------|-------|-------|-------|---------|
| 1936 | 8,364 | 5,485 | 8,253 | 3,243 | 6,989 | 2,590 | | 2,608 | 1938 創立 |
| 1942 | 7,055 | 5,852 | 12,598 | 7,691 | 13,129 | 5,038 | 5,108 | 2,428 | 5,369 |
| 1943 | 8,455 | 6,099 | 15,377 | 9,059 | 14,582 | 5,599 | 5,714 | 2,257 | 6,376 |
| 1944 | 9,102 | 6,177 | 15,900 | 9,743 | 15,047 | 6,042 | 6,343 | 3,292 | 7,858 |

資料來源：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

隨戰事的擴張，為保障廣大貧窮學生能夠公平地接受教育，便依據實際需求，對原有的公費制度施行的辦法進行修正，一九四五年八月，改訂頒發《戰時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給予公費辦法》，將原本分院科的制度進行變更調整，僅分為兩類，如下：

一、全公費：免學膳宿費；若為國立中學的保育生，大中學校的師範生，抗戰功勳者的子女，革命功勳者的子女亦屬全公費。

¹⁵⁴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頁 10。

二、半公費：學膳宿費免去一半。¹⁵⁵ 除此之外，對於國立中等以上學校，及省立專科以上學校各科新生，因經濟來源確已斷絕之戰區生或僑生；或家境確屬清寒的學生，和本人收入不足供給求學用費的公教人員的子女，亦可申請公費，惟名額有限，只佔各校註冊入學新生總額的百分之四十。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教育部對於公費制度為因時因地制宜，讓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大學及青年學生的控制提高，藉由學行成績為考核標準，加入強化大學教育質量，培養國家所需的人才，並且規定教育部可於必要時指定公費生服務。教育部雖然仍根據抗戰建國的人才需求優先分配公費生名額，但隨著規定的修正，公費名額逐步放寬，公費制度原以救濟戰區青年為實施對象，以戰區及經濟來源斷絕的學生為主，申請公費的人數卻因為戰事緣故，國民經濟並未好轉，公費生跟著戰區擴大，人數也逐漸增加，公費制度似乎又如同貸金般，讓貧窮學生能享受公費，落實教育機會均等，救濟之意仍高於教育。



¹⁵⁵ 行政院新聞局，《貸金公費獎學金》，頁5。

第五節 師資審查制度的完備

在抗戰建國時期，每一位國民都有責任成為抗戰建國的忠勇戰士，以求抗戰勝利，然而有賴於教育，而負此責任的就是教師，因此教師在抗戰建國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部為了提升學生競爭力，改善大學素質，除整頓課程外，亦著手進行大學師資的審查，因為必須要有優良的教師，才能培育出優秀的下一代，所以培養具有樂業、敬業、專業、創業的教師¹⁵⁶，儼然成為教育改革中教育品質提升的重要關鍵。本節針對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全面抗戰時期針對大學師資審查制度的建立過程與要點進行探討。

壹、教員資格的確立

中國高等教育教師的待遇經歷不斷發展與修正的過程，雖自清末以來對於專科學校以上的學校教師聘用、待遇日漸完備充實，但對於資格的審查卻沒有明確的規定，由於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剛起步，仍處於探索階段，針對教師資格與待遇，多是以歐美國家為借鑒，過去中國高等教育師資的來源向來以留學生為主，多以外國所學的知識傳授於學生，常會出現學成歸國卻不適用的不良現象，使得中國當學淪為「文化租借」，教育界認為這樣的情況不僅浪費國帑，也會妨害本國學術權威的建立與國家培植人才的統治計畫。在戰前大學教員，除了少數學校外，資格漫無標準，涉近冗濫，國聯教育調查團早有批評，社會亦嘖有煩言。¹⁵⁷ 雖然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教育行政委員會就曾經公布「大學教員資格條例」¹⁵⁸，根據大學教員的名稱分為四等，一等曰教授；二等曰副教授；三等曰講師；四等曰助教，在規程中訂定任職的資格，作為檢

¹⁵⁶ 莊焜明，《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之研究》，頁 323。

¹⁵⁷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7。

¹⁵⁸ 大學教員資格條例，取自：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3%80%94%E5%A4%A7%E5%AD%B8%E5%8F%8A%E7%8D%A8%E7%AB%8B%E5%AD%B8%E9%99%A2%E6%95%99%E5%93%A1%E8%81%98%E4%BB%BB%E5%BE%85%E9%81%87%E6%9A%AB%E8%A1%8C%E8%A6%8F%E7%A8%8B%E3%80%95>

定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之依據，規定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必須由大學評議會負責審查，經審查合格的教員，由中央教育行政機關認可發予證書，但實際上各校並未落實此審查機制，探其主因為各校並未組織大學評議委員會，導致大學教員資格審查因亦未執行。

國聯教育考察團曾針對中國大學師資問題提出批評：「蓋中國大學擴張必然之結果，以使教師人數增加。一九一二年之大學教師，不過二百二十九人，一九一六年即增至四百二十人，今日又十倍於此數矣。此數千師中，故不乏特出之人才，但因人數增加知迅速，即發生種種待決之問題。即現在大學隻整個教育授事業制度，決不能為已有完善之組織，而使其所蓄之人才各盡其最大之效用。」¹⁵⁹國聯教育考察團指出師資品質參差不齊的問題，關係大學實質至深，教師沒有確定的名份，以及合理的待遇保障，因此釐定一妥善標準的審定教員資格是提升大學素質必要的措施。

教育部為此規定各級師範學院師資訓練應由中央主持辦理，經過多方籌劃後，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公布了「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聘任待遇暫行規程」，同年十月頒行「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並且成立學術審議委員會，掌理著作發明之獎勵、教授資格之審查，以及審議高等教育改進等事項。¹⁶⁰透過學術審議委員會主持師資審議的工作，規定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級，以及其任職資格，並且明訂教員依等級、職位、年資、學歷、教學成效、著作……等，任職不同職位教員皆有其規定，如下：

一、助教須具以下資格之一：

- (一) 國內外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而成績優良者；
- (二) 專科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曾在學術機關研究或服務二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¹⁵⁹ 國立編譯館，《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書》，頁 166。

¹⁶⁰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12。

二、講師須具以下資格之一：

- (一)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得有碩士或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成績優者；
- (二) 任助教四年以上，著有成績，並有專門著作者；
- (三) 曾任高級中學或其同等學校教員五年以上，對於所授學術確有研究，並有專門著作者；
- (四) 對於國學有特殊研究及專門著作者。

三、副教授須具下列資格之一：

- (一)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成績優良，並有價值之著作者；
- (二) 任講師三年以上，著有成績，並有專門著作者；
- (三) 具有講師第一款資格，繼續研究或執行專門職業四年以上，對於所習學科有特殊成績，在學術上有相當貢獻者。

四、教授須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 (一) 任副教授三年以上，著有成績，並有重要之著作者；
- (二) 具有副教授第一款資格，繼續研究或執行專門職業四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者。

《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明確規定擔任高等教育的師資應具備的資格及所能獲得的待遇及保障，以建立公平客觀的師資審查制度。除此之外，成立於抗戰時期的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是民國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學術審議制度的創始，亦是為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而設。戰時教育部認為提高大學素質，審定教員資格，證明定分，對合格者優禮獎勵，乃當務之急。¹⁶¹根據《大學及獨立學院

¹⁶¹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文教論評存稿》，頁 27。

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學審會委員由當然委員、聘任委員與常務委員組成，其中教育部長、次長及高等教育司司長為當然委員；另設聘任委員二十五人，由教育部直接任命者十二人，其餘十三人由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院長或教授選舉，再由教育部根據選舉結果聘任之，聘任委員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¹⁶²聘任委員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校長或國立獨立學院院長者；（二）現任或曾任公立研究院院長或研究所所長；（三）曾任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教授七年以上著有成績者；（四）對於所專習之學術有特殊之著作或發明者。¹⁶³

教育部賦予學術審議委員的任務，其內容包括：（一）審議全國各大學學術研究事項；（二）建議學術研究之促進與獎勵事項；（三）審核各研究所研究生之碩士學位授予暨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事項；（四）審議專科以上學校之重要改進事項；（五）專科以上學校教員資格之審查事項；（六）審議留學政策之改進事項；（七）審議國際文化合作事項；（八）審議教育部長交議事項，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主要工作側重於專科以上學校教員資格之審查，及著作發明與學術作品之獎勵。¹⁶⁴

全面抗戰時期學術審議委員會的成立，可說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指導學位制度建設的最高學術權力機構，透過學術審議委員會的建置，落實尊重專家意見，依公平且客觀的標準，不僅讓國民政府能以統一全國高教學術標準，更強化戰時的學術研究，且學術審議委員會的成員，是由教育部與校方人員代表共同組成，在資格審查前，亦會依學科性質分請各科專家先做初步的審查，再由學術審議委員會做最終的決定，這亦是吳俊升在戰時中國教育一文提及，認為戰時建立的師資審查制度推行過程較為順利的原因。¹⁶⁵

¹⁶²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15。

¹⁶³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15。

¹⁶⁴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15。

¹⁶⁵ 吳俊升，《戰時中國教育》，頁 27-28。

貳、獎勵制度的建立

在抗戰時期，大學教員資格審查規程的建立，提高大學素質，經過審查合格的教員不僅可獲聘任保障，在待遇、休假進修，加給研究費與獎助金都明文的規定，不僅如此，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透過提高教師待遇，保障教師工作條件，更加穩定戰時學校秩序。

根據一九四〇年八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聘任待遇暫行規程》，根據高校教師的工資待遇與任職資格做出統一規定，將大學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四等，內容明訂教員薪資。除了教授分為九級外，其餘副教授、講師、助教，皆分為七節，若在大學及獨立院首次擔任教員者，則依最低級為起薪，但若曾擔任教員、任教著有成績或有特殊情形者，則可有學校酌予晉級。

表 4-3：

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薪俸表

| | 第一級 | 第二級 | 第三級 | 第四級 | 第五級 | 第六級 | 第七級 | 第八級 | 第九級 |
|-----|-----|-----|-----|-----|-----|-----|-----|-----|-----|
| 助教 | 160 | 140 | 120 | 110 | 100 | 90 | 80 | | |
| 講師 | 260 | 240 | 220 | 200 | 180 | 160 | 140 | | |
| 副教授 | 360 | 340 | 320 | 300 | 280 | 260 | 240 | | |
| 教授 | 600 | 560 | 520 | 480 | 440 | 400 | 370 | 340 | 320 |

資料來源：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一九四〇年八月教育部公佈之「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聘任待遇暫行規程」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薪俸表。¹⁶⁶

¹⁶⁶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16。

教育部除了明訂教員薪資待遇外，因為戰時社會環境動盪不安，物價飆漲，人民生活困難，教育部於一九四一年為使教員能夠安心服務，訂定「非常時期改善教職員生活辦法」，政府除了給予薪金外，另發給較原及其家屬平價食糧代金，並根據物價及生活狀況，另發給每人每月生活補助費，不僅補助抗戰時期困苦的生活，也獎助服務有成績的高校教員，如：舉辦著作發明的獎勵，分為文學、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古代經籍研究五類；科學及技術發明之獎勵，分應用科學和工藝創造兩類。教育部在還推行「久任教員獎金」¹⁶⁷、「甲乙兩種獎助金」¹⁶⁸、「特別補助費」、「兼課鐘點費」…等制度。隨著戰事日益嚴重，一九四三年一月，經審查合格的教師，每月發給學術研究補助費，用於購置圖書、儀器、文具等，以供研究使用。¹⁶⁹教育部不僅給予教員實質的薪金外，於一九四一年五月頒布「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休假進修辦法」，規定國立專科以上學校對於連續在校專任教授滿七年以上成績卓著者，應准予離校考察或由就半年或一年之機會。考察或研究期間支薪給由原校照發，休假教授不得兼任其他有給職務；申請休假進修之教授應擬具計畫，經教育部核准後，始能休假進修，經核准休假進修教授，教育部並得委託擔任視察、講學及審查等事項。¹⁷⁰教育部在學術日新月異的時代，提供教師國內、國外的進修機會，有益教師增進新知，儘管在烽火連天的抗戰環境中，國民政府仍不放棄教育，且對於學術研究不遺餘力，這亦是中國抗戰勝利重要的原因之一。

¹⁶⁷ 久任教員獎金係針對任職達到一定年限的教員發給獎金。

¹⁶⁸ 甲乙兩種獎助金分別為：甲種以獎助具有價值之研究報告專科意中譯著短篇論文之教員為主旨，採取給研究著述者稿費的形式；乙種以獎助家境特別困難，或生活上有特殊需要之教員為主旨，採取補助與借貸兩種形式。

¹⁶⁹ 張在軍，《戰亂與革命中的東北大學》，頁 197。

¹⁷⁰ 教育部編，《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頁 521。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主旨為瞭解教育在國家面臨重大災難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以吳俊升在全面抗戰時期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時，推動高等教育政策的概況，進行研究與分析，提出以下四點研究發現：

壹、戰時平時化的教育方針，奠定抗戰建國併重的基礎

當國家面臨戰爭的時候，政策改革的聲音呼之欲出，不同立場者對於教育的需求容易出現衝突。全面抗戰時期教育界亦出現不同的改革聲音，尤其對於高等教育最為明顯，部分人士支持徹底打散教育體系，施行軍事教育，培養能上戰場的青年；部分人士支持在現有教育內進行修正，改善其缺點並加入符合社會需要的教育。綜觀這場爭論，不論是支持徹底改革教育派，或是改革充實派，兩者都在民族存亡的危急時刻期待能以教育救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知識份子是民族文化的乘載者，擔當著抗戰建國的使命，而國民政府則是扮演這政策的決策者，如何有效整合各方意見，並制訂合宜的戰時教育政策，攸關著國家命脈與發展。

吳俊升在全面抗戰時期前，從中國的實際現況察覺到，長久以來中國的教育一味模仿西方，教育實施缺乏一套適合中國社會的教育理論，教育沒有一種根據，導致教育茫然無目標，因此認為有必要建構一套適合中國的教育哲學，並以此哲學作為教育實施的指引。中國教育學者們雖然許多都取經於西方，卻也試圖尋找中國的固有文化，然而在一九三〇年代，中國內戰日軍侵襲下，民族救亡圖存的社會氣氛，中國教育哲學遂定調為一種救國主義的教育哲學——三民主義教育學。

針對全面抗戰時期，提出戰時教育平時化的方針，不僅與當時教育界認為應維持正常教育體系的想想法雷同，這符合國民政府抗戰建國綱領的精神，因此受時任教育部

長陳立夫重視，聘為抗戰時期高等教育司司長一職，秉持抗戰與建國併重的原則，持續改進高等教育的問題。有賴於此，才能讓高等教育不但沒有因為烽火而偏廢，且創造了豐碩的成果。

貳、整頓高等教育，提升高等教育品質

國民政府在砲火隆隆的抗戰時期，為安定社會維持教育，教育部著手整頓高等教育，調整學區分佈，改善長期以來，教育資源分佈不均的問題，將東部沿海地區受戰爭影響，或是戰區內的大學紛紛內遷，或是組成聯合大學，並透過增設高等教育，加強學術研究，透過教育對人心的啟迪、民智的教化都深具意義，不僅保存中國文教事業，也為內陸地區的現代教育奠定基礎。

針對大學龐雜的科目規定統一標準，並藉由召開課程會議，詳細討論科目名稱、學分、數目、修習年次，在高等教育院系科目互相重疊的問題上，教育部合併或裁撤重疊的課程，擬定公布文、法、商學院必選修學分表科目表；農學院及工學院的共同必修科目表，設由教育部農業教育委員會及工業教育委員會擬定；商學院的共同必修科目表則是由教育部根據各商學院現行課程的實際狀況，與國立商學院教授共同擬定理想科目表；師範學院則是依據一九三八年七月頒布的「師範學院規程」遵照施行。由此可見，教育部採納各領域專家建議，並針對中國戰時需求進行課程整理，以提供最符合中國需要的課程。

在教材內容上，透過成立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選定一套合乎中國需要的教材，不只提高學生程度，課程內容也與國家文化及建設的政策相吻合，這些課程整理的措施，除了解決教育經費被瓜分的問題，也讓戰時師資缺乏的問題稍紓困之。

參、教養兼施的貸金與公費制度，培育抗戰建國的人才

在傳統的社會型態裡，教育往往為少數人所享有，社會地位決定接受教育的多寡，但隨著社會的變遷，教育不再如過去反映社會階級與結構，希望透過教育，成為更自由、更平等的社會，因此教育機會均等是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一致目標。抗戰時期國難當頭，貸金與公費制度的實施，雖然造成國家財政極大的負擔，卻是確保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依舊能維持教育的重要政策，讓數以萬計的學生不因此離開校園，且能在烽火連天的戰爭中堅忍求學，讀書救國，打破過去教育只有大部分富裕人家能享有，進一步促使教育公平發展。不僅為抗戰勝利培育出一批優秀的人才，也讓抗戰時期的學校及學生人數，不減反增。

首先，國民政府推動貸金制度，對於大學院校的學生，不僅教還有養，由吳俊升奉命擬定貸金辦法，對於學生的膳食、被服、零用，均以貸款給付，並根據戰地實際狀況給予補助，最初的貸金制度僅在大專院校實施，但隨戰事越來越嚴重，國民政府將貸金度推廣至所有戰區內的中等學校學生，原先希望學生畢業後能夠償還，但還款情況不佳，好來所性改為公費。

然而公費制度，除了改善學生還款情形外，為平衡抗戰前文法商學生與實科學生比例不均的問題，教育部根據抗戰建國的人才需求，落實分配公費生名額，以較為優惠的補助，核給就讀醫、工、農、法、師範學院的學生，也吸收更多學生修習實用科學，解決抗戰時期實科教育缺乏的人才，深合中央高等教育注重實科之意。政府施行公費制度，雖然須負擔學生就學期間的學費，但能藉公費制度規範學生的學習成績與品行，讓學生學成後服務社會，能保障在投入高成本的教育經費中，為國家盡一份心力。

肆、落實師資審定，提高教師素質

國民政府教育部在一九四〇年公布《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員資格審查暫行規程》，對大學教員的任職資格做了明確的規定，規定教師的職稱、級別、相應領取的薪資，並提供休假於國內、外進修的機會，保障教師地位，也提高教師待遇。

教育部透過組織「學術審議委員會」，專門負責審查專科以上教員，委員會的成員由教育部次長與高等教育司司長、教育部聘任委員、國立專科以上教授所組成，組織成員包括專家學者與行政代表。教育部厲行師資審查的機制，詳細規定教員的送審資料，包括：履歷表、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著作品、服務證書、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共五項雖然初期在執行時不如預期順利，教員對於審查機制，多以消極態度不配合。為促進大學教員登記意願，教育部並於一九四一年再制訂《部聘教授辦法》，部聘教授要接受學術審查委員會的資格審查，為教育的特設講座，從事講學及研究，享有更高的薪資，可見為落實教師資格審查機制，教育部運用權力，也讓較被動、不願配合的教授就範。

在抗戰建國時，教師負責培育各種事業的人才，應積極的充實，師資好壞直接影響教育成果，應盡量優禮教授、學者、專家，教育部藉由對教授研究經費、休假、國內外進修、退休撫卹的審核權，透過就計畫的培植，讓高等教育負起學術報國的責任，並且培養高等教育的學術風氣，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及出版的工作，在學術日新月異的時代，不僅有益教師增進新知，更能藉此穩定抗戰時期高等教育的師資。

師資審查制度的建立，不只審查教師資格，亦提供更多資源給教師，這項制度的建立，對於教師具有督促鼓勵的作用，也保障大專院校教師的地位與尊嚴，是促進高等教育的一項重要措施，在對日抗戰中實施尤具特別意義。

第一節 建議

壹、政府施政方面

一、高等教育的政策

教育是社會的產物，教育制度的發展會隨時代產生變革，無法離開現實環境孤立而存，因此教育與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有密切的關係。國家若要強盛，就必須增強國家競爭力，國人必須要有不斷開創新知識的能力，然而這項能力有賴高等教育的啟發與培育。有鑑於此，教育部為提升大學教學品質，政府紛紛投入大量的經費與資源引導大學發展特色與創新的教學，政府若要有效推動新的教育政策，務必在推動新的政策前，要先了解過去歷史發展的脈絡，並蒐集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以古鑑今，才能解決現實環境須解決的教育問題，並且作為預測未來的基礎。

二、高等教育的專業發展

教育的發展與社會環境有直接的關係，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行政院提出教改總諮議報告書，內容主張教育鬆綁、暢通升學管道、提升教育品質，雖然促成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代表著大學教育不再僅是菁英教育，任何人都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臺灣高等教育學校類型結構也因此更加多元化，但高等教育快速擴張，也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如：沒有適量管控的高等教育，可能因環境因素，出現人才供需失衡的問題，學生無法學以致用，甚至出現畢業即失業的問題，浪費成本極高的高教資源。高等教育的發展，涉及到課程規劃、經費資源的取得與運用，這些環環相扣的措施都涉及高等教育的發展。抗戰時期，政府為配合抗戰建國的需要，在培育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及社會需求都有詳細的規劃與限制，高等教育對於人才的培育，本該有所控管，才能將資源花在刀口上，以達到真正的適性揚才。

三、公費制度的實施

在全面抗戰時期，為了培育抗戰建國人才，以及解決文法商與實科學生比例失衡的問題，國民政府推動公費制度，並規定公費學生人數及畢業後的服務。我國最初的師資培育重視實施三民主義國民教育為基礎，以公費制度為主軸，直至一九九四年師資培育法的頒行，開放多元師資培育，改以自費生為主，師資公費培育則為輔助措施。但因為師資培育制度的改變，加上少子女化的衝擊，教師員額進行總量管控，導致近年來流浪教師人數逐年攀升，但偏鄉學校卻仍是長期面臨找不到、留不住老師的困境，為了穩定偏鄉地區的師資，保障偏鄉學童的受教權益，政府於二〇一八年通過「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公費生畢業後考過教檢即可任職，分發到偏鄉擔任教師，或原本靠偏鄉地區學校甄選取得教師職位者，將服務由至少四年改為六年，義務期滿才能申請轉校。雖然政府將公費生的義務期延長，但偏鄉地區依舊面臨師資年年流動的危機，為改善偏鄉師資不穩定或公費生期滿就調走的狀況，政府不如因地制宜，直接用在地人才，或依預定分發區，優先錄用設籍在當地的師培生，以解決偏鄉地區師資不穩定的問題。

四、高等教育的師資

大學教師的良窳影響著高等教育之教學品質，近年來國內大專校院增加，在大學評比上，常受績效責任影響，相較於過去只需進行教學與學術研究為主的工作內容，有很大的差異。近二十年來，常會以競爭型獎勵方式搭配各項績效評鑑，如：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簡稱 KPI），優點是易看出施政成效與需檢討的地方，卻被迫不同性質的學院，以相同的指標作為標準，使得台灣大學校園原本多元的學術生命力遭扼殺。教學與研究是大學教師主要任務，他們具備專業學科知能，且投入教學技能的專業發展與學術研究，提高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成效，以達到培育國家人才為目標。但近年來大學校院為爭取更多的教學資源，或是教師為爭取升等

的機會，便會要求大學教師需有很多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 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學術文章發表，為了升等、續聘、經費，大學教授各個都卯足全力的為自己的績效努力，甚至出現為增加論文的數量，以掛名或是以抄襲造假的方式，造成許多大學負面問題的產生。大學教師升等資格的審查，涉及教師的工作權，以及職業資格的取得，因此國家應透過法律制度、組職妥善建置，更加保障大學教師的基本權利。

貳、未來研究方面

本研究藉由吳俊升的學思歷程、教育思想，進一步考察其在抗戰時期對於戰時教育平時化的方針、高等教育改進的各項政策，但仍有一些議題尚待研究，主要整理為以下：

一、吳俊升卸下高等教育司長後的教育生涯

本研究關注於吳俊升在全面抗戰時期擔任高等教育司司長，所推動的高等教育政策，但對於吳俊升一九四四年跟隨教育部長陳立夫請辭後，在南京、台灣、香港仍持續不間斷的教育生涯，且吳氏對於中國高等教育做出了不可沒滅的貢獻，但時人鮮少論及，此有待進一步探討。

二、復員時期的高等教育研究

抗日戰爭接近勝利後，教育部為了配合整體抗戰與建國並進的教育計畫，在教育上的維持，以及收復區敵偽所設的文化教育事業應如何接收或改組，都直接影響國家整體教育。雖然抗戰不屬常態，但有許多吳俊升在抗戰時期所推動的高等教育政策，仍在復員後，透過改進持續推動，甚至維持至今。雖然國內關於抗戰時期的論文非常多，但關於復員時期的高等教育研究極少，值得加以耕耘。

參考文獻

一、書籍

- 王聿鈞、孫斌（2017）。**朱家驊先生言論集**。臺北市：秀威。
- 王文科（2003）。**教育研究法**。臺北市：五南，。
- 王炳照、閔國華（1994）。**中國教育思想通史第七卷**。湖南省：湖南教育出版社，。
- 司琦、徐珍（1997）。**吳俊升先生暨夫人倪亮女士年譜**。臺北市：三民書局，。
- 朱經農（1941）。**近代教育思潮七講**。臺北市：臺北商務印書館，。
- 杜元載（1972）。**抗戰時期之高等教育**，臺北市：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編撰委員會，
- 呂芳上（2013）。**民國史論（上冊）**。臺北市：臺灣商務。
- 呂芳上（2013）。**民國史論（下冊）**。臺北市：臺灣商務。
- 行政院新聞局（編）（1947）。**貸金 公費 獎學金**。臺北市：行政院新聞局。
- 吳明湘（1963）。**中國教育之改進**。臺北市：文星書店。
- 吳俊升（1983）。**文教論評存稿**。臺北市：正中。
- 吳俊升（1968）。**教育論叢**。臺北市：臺灣中華。
- 吳俊升（1972）。**教育與文化論文選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吳俊升（1976）。**教育生涯一周甲**。臺北市：傳記。
- 吳俊升（1970）。**教育哲學大綱**。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 李奉儒等（1997）。**教育學的歷史研究之現況與趨勢**，載於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主編），**教育研究方法論文集**，285-313。高雄市：麗文，1997。
- 周川（2005）。**百年之功—中國近代大學校長的教育家精神**，福建省：福建教育出版社。
- 金以琳（2000）。**近代中國大學研究**。北京市：中央文獻出版社。

- 竺可楨（2004）。**竺可楨全集**（第6卷），上海市：上海科技教育。
- 竺可楨（2005）。**竺可楨全集**（第7卷），上海市：上海科技教育。
- 林玉体（2005）。**西洋教育史**。臺北市：三民，2005。
- 易社強（2010）。**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台北縣：傳記文學出版社，2010。
- 郝伯村（2018）。**郝伯村重返抗日戰場—增訂版**，臺北市：天下文化，2018。
- 陳立夫（1994）。**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市：正中，1994。
- 陳立夫（2005）。**撥雲霧而見青天**。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
- 陳立夫（1973）。**戰時教育行政回憶**。臺北市：臺北商務印書館，1973。
- 陳啟天（1955）。**世界國家主義運動史**。臺北市：冬青，1955。
- 郭湛波（2006）。**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上海市：古籍出版社，2006。
- 張在軍（2013）。**西遷與東還**。臺北市：秀威，2013。
- 張在軍（2015）。**戰亂與革命中的東北大學**。臺北市：秀威，2015。
- 秦孝儀（1978）。**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第四冊）。臺北市：中正文教基金會。
- 教育部編（1948）。**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上海市：商務印書館，1948。
- 郭岱君（2015）。**重探抗戰史：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臺北市：聯經，2015。
- 陶涵（2010）。**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上、下冊）。臺北市：時報出版社。
- 楊國賜等人（1988）。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載於中國教育學會（主編），**現代教育思潮**，267-297，臺北市：師大，1988。
- 梁福鎮（2006）。**教育哲學：辯證取向**。臺北市：五南。
- 溫明忠（2011）。**《高等教育經濟學》**。臺北市：高等教育。
- 中國教育之改進：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書**（1932）。南京市：國立編譯館。
- 簡成熙（1993）。**教育哲學—理論、實務語文選**。高雄市：復文。

羅家倫（1952）。**文化教育與青年**。臺北市：華國出版。

藍海正、劉彩梅（2018）。**中國教育史**，臺北市：崧燁文化。

二、期刊

方永泉、張天泰（2011）。過度追求「量化」與「效率」的學術評比，讓「研究」取代了「學問」。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2），15-16。

王朝輝（2007）。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對高校學生的經濟救濟。東山師範學院學報，22（4），96-99。

白云（2006）。毛澤東教育改革思想對高等教育創新的啟示。教育探索，175，9-10。

吳俊升等人（1935）。全國專家對於教育救國的信念。教育雜誌，25，1-59。

吳景宏（1940）。戰時高等教育問題論戰的總檢討。教育雜誌，30，1-12。

何卓飛（2012）。教育部推動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檢討，臺灣教育評論月刊，1（6），28-34。

胡門祥（2007）。論張申府的戰時教育思想，教育評論，5，115-118。

周曉東、韋福安（2006）。抗戰時期江西特種教育述論。重慶師範大學學報，6，34。

馬宗榮（1938）。今後的高等教育問題。教育雜誌，28，1-9。

張伯謹（1938）。卑而不高的戰時教育論。教育雜誌，28，19-21。

張珊珍（2006）。陳立夫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教育。抗日戰爭研究，3，90-110。

黃覺民（1938）。戰時課程問題，教育雜誌，28，1-8。

武漢市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1998），全國蒞漢教育文化界要求實施抗戰教育快郵代電，武漢文史資料，154。

三、學位論文

李建勛、許椿生（1942），**戰時與戰後教育**（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西北師範學院師範研究所，蘭州市。

李立柱（2010），**吳俊升教育哲學思想研究—基於《教育哲學大綱》為中心的考察**（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師範研究所，上海市。

汪伯軒（2012），**陳立夫與戰時中國高等教育**（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臺北市。

莊焜明（1979），**抗戰時期中國高等教育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臺北市。

管美蓉（2005），**大學入學考試制度與教育控制-台灣地區的歷史考察（1949-2001）**（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市。

陶莎（2007），**抗戰時期大學課程調整**（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遼寧師範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大連市。

四、網址資源

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取自國家教育研究院：<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2562/?index=9>

全國教育會議（2000年12月），取自教育百科：<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5%85%A8%E5%9C%8B%E6%95%99%E8%82%B2%E6%9C%83%E8%AD%B0>

抗日軍政大學（無日期），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5%86%9B%E6%94%BF%E5%A4%A7%E5%AD%A6>

抗日軍政大學（無日期），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5%86%9B%E6%94%BF%E5%A4%A7%E5%AD%A6>

抗日軍政大學（無日期），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97%A5%E5%86%9B%E6%94%BF%E5%A4%A7%E5%AD%A6>

胡金平（2019年3月）權利與權力的博弈：1930年代「整頓大學」引發的學術論爭論，取自：http://www.sohu.com/a/298835535_387114

涂爾幹教育社會學思想（無日期）。取自國家教育研究院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8513/?index=5>

梁甌地（1938年3月），**戰時的大學**，取自臺灣華文電子資料庫 <http://taiwanebook.ncl.edu.tw/zh-tw/book/DRNH-9900006708/reader>

蔣中正（1937年12月16日）。我軍退出南京告全國國民書，取自維基百科：<https://zh.wikisource.org/zhant/%E6%88%91%E8%BB%8D%E9%80%80%E5%87%BA%E5%8D%97%E4%BA%AC%E5%91%8A%E5%85%A8%E5%9C%8B%E5%9C%8B%E6%B0%91%E6%9B%B8>

